

觀察

• 元千六售份每 • 日三十月二十年六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週 •

期六十第



卷三第

專論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

學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
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

儲安平

敬答樊弘先生
中國能永遠中立化麼？

張東蓀
端木正

共和黨援華運動

楊剛

我們訪問了斯大林

K. Ziliacus

政治年度總結賬

(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看今日河北

(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通信

北平自治會競選記

(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爐邊天下(二)從冷仗說起

費孝通

游歷者的眼睛

錢鍾書

讀者

答樊弘先生 北方哀情

投書

上海雜誌界聯合宣言

撰稿人

蕭韜 戴鏡 錢鍾書 趙海西 楊西 費希 程希 馮希 章希 張希 張希 梁希 夏希 陳希 許希 高希 孫希 柳希 胡希 宗希 周希 李希 李希 吳希 沈希 伍希 王希
 公德 世覺 端清 邦維 超海 西 孝 希 有 移 東 沉 實 炎 瘦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廣 純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培 光 民 升 康 彥 藩 構 宗 孟 絳 通 雷 孟 至 守 今 孫 長 秋 德 竹 松 蔚 敷 寬 忘 適 恭 亞 田 青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翹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會 馮 章 黃 張 張 張 曹 陳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李 周 沙 李 吳 吳 何 任 王 玉
 翹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會 馮 章 黃 張 張 張 曹 陳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李 周 沙 李 吳 吳 何 任 王 玉
 翹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會 馮 章 黃 張 張 張 曹 陳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李 周 沙 李 吳 吳 何 任 王 玉

撰稿人



本刊自本期起

每冊售六千元

讀者先生：本刊自本期起，每份售六千元。

我們在第八期收售五千元時，曾表示希望這五千元售價能維持兩個月。兩個月是多麼短的一個時間，但在今日物價這樣波動的局而下，兩個月又是多麼長的一個時間！我們現在自五千元增售為六千元，加了兩成，但是我們看，這兩個月中物價漲了多少！在兩個月前，紙價每令八十多萬，最近一度最高跳到每令一百四十餘萬，我們最近買進的一批紙是每令一百二十八萬。排印工這兩個月中已漲過兩次，每次漲了三成，兩次合起來等於漲了七成。事實上，在中個月以前，我們就需要加價了，但終於又熬了兩期。上星期密勒士評論週報已自每份一萬元加到一萬五千，世界知識亦自六十加到一萬元，我們現在勉強強強加了一千元。這一千元的收入增加，當然抵不過日益加重的支出增加，但讀者的負擔我們又不能不顧及。我們祇得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下忍耐苦撐下去。

關於直接訂閱的費用，我們略作說明。三個月十二期，我們照例應收費六萬元，但我們現在改收六萬五千元，一方面因為物價波動得太利害，我們收了三個月或六個月後，又不好再加價，所以不得不將加價的可能性略為計算在內。另一方面，我現在每個定戶每期寄刊所用的牛皮紙信袋，已經要化到一千二百元一個，這個負擔實在太重，希望讀者和本刊雙方大家分担一點，所以我們決定每三個月平寄收六萬五千元，務請定戶先生函予諒察。

合訂本加價在即

本刊合訂本將自明年元旦加價，在本年十二月以前購買者，仍照原價出售。目下計有第一卷上冊，第一卷下冊，第二卷上冊，第二卷下冊，第三卷上冊五種，每冊售六萬五千元，郵費另加。我們的合訂本已售完好幾批，這次再版了一千五百本。這一批售完後是否再印，不能說定，希望要購存本刊合訂本者，從速函購。

答樊弘先生

編者先生：三卷十四期樊弘先生「與梁張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一文已讀過，茲略答數語，乞於讀者投書欄中刊出為幸。

在「預告選災論憲政」一文中，一開頭我即聲明，我只不過借此番選舉舉行憲政的機會，再度向國人提出我夙來傾軋外國憲政的話。——那亦就是表明這算不得正面主張。臨末，更有如下之聲明：

在我看憲政既不可久，則如何為中國政治求一正當出路，自應早為之計。那麼，多年蘊蓄於衷者，就當一傾吐，以貢獻於國人。所以退而著書，實有必要。

廿年來，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解決，是有一整套主張底，並不止政治制度一項。但主張之提出，不能就提出主張而止；必須提出所以作此主張之由來。那即是理論。戰前傳者，於主張及理論皆多未周。今所寫之「中國文化要義」一書，登載理論方面。它主要在闡明老中國是如何一回事；然後才能認識近百年所演成之中國問題；然後才能談到中國之前途出路。凡自己主張之建立，他人主張之否認，莫不以此為本。上文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有言之過於濶括難於盡曉者，得此書可以明白。讀者設於本文有批評見解之處，不妨待之全部理論主張看過之後也。

不知樊先生為什麼這樣心急，不但不等待者全部理論，而且不等待看見正面主張，只摘拾我對英國式憲政所懷疑其不合中國眼前建國之用之第六點一兩句話，而製造一箇「通」又治」名詞，強加到我身上而譏諷之批評。須知在其懷疑意見中之某點，亦許是透露其正面主張之一點影子。但如此捕風捉影的批評，有何意味呢？樊先生如自己有見解主張須發表，儘可立題目寫文章發表好了。何必抓住我和東瀛先生兩人，來借題發揮呢？

請看樊先生對我們的譏諷

（上略）所以梁張二先生所倡導的通儒政治，好像鏡花水月，完全是虛幻的，空想的和無效的。本來實際的政治好複雜，但哲學家們都不免把它看得太簡單了。這便是梁張二先生通儒政治的弱點。佛陀的手掌假如能把世上豹頭馴服下來，使他們都各長上翅膀，把小孩牽到月宮和彩雲裏去游玩；這是何等美觀啊！但可惜射狼還是要吃人，這箇美觀的理想辦不到啊！

我們既然這樣這呆不中用，而樊先生於其文章開頭還要說「請求兩位前輩改正」；那未免過謙，實在用不著！我只勸樊先生且慢一點把旁人看得那樣不中用，而只好學深思領導青年，則於大學教育為幸多矣！

恕我不能就問題內來商榷。因為我的意見要提出必得全部提出，不能零碎提出來說。這次便是吃了零碎提出的虧，只引人誤會，而未能使人明白也。

北方哀情

編者先生：茲有友人最近自本溪湖來函，語多酸鼻，茲節錄兩節，乞在貴刊刊出：

一、最近撫順東營盤一地，發生軍事。據撫順來人談，營盤乃撫順煤礦門戶，守軍僅開七日，無糧軍可調，乃派空軍轟炸，房屋全燬，平民死亡數目在一萬人以上。

二、我前幾天因公赴瀋，馬路上到處是流亡的人，年輕的年青的都有。有許多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拿了一些報紙或刊物叫賣，狀極哀慘。本溪湖煤礦有限公司注濟辦事處職員王姓，住在一家院內，該院內有兩家，每天祇買些棒子麵用開水沖食與腹。又有一家，共有五人，但五人祇有一件小棉襖，因為其餘的衣服都賣掉了。

上海雜誌界聯合宣言

上海各雜誌社鑒於過去缺乏聯繫，業務諸多困難，最近物價波動劇烈，尤感支持不易，爰於十二月五日集議，為左列二事之陳述：

一、組織公會：十月二十四行政院修正出版法，規定出版品分新聞紙、雜誌、及圖書三類。新聞界業有報業公會，書業業有書業公會，獨雜誌界尚無公會之組織。同人等身受種種痛苦，認為有即刻組織公會之需要，俾對發行、廣告、印刷、裝訂各項業務，有一統一之計劃，協力合作，以利文化之傳播。現正進行公會之籌備工作，即行具呈政府，請求批准。吾等竭誠希望政府困難，同情處境，允許吾等成立公會。

二、要求配紙：年來紙價飛漲，出版界難於負擔。政府為維持文化事業起見，爰有官價紙之配給，但官價紙之分配，尚須求其普通公平。所有經政府核准登記之出版單位，均應同等享受此種配給之權利。雜誌界之實力素極脆弱，又無鉅額廣告費之收入，平時純賴發行，勉力維持。最近紙價一再漲漲，售價則無法比例增加。同人等過去大都未能獲得官價紙之配給，擇扎至今，筋疲力盡，整個雜誌界業已瀕近崩潰之階段。我們為特要求政府為維持文化雜誌業之存在，（下接二十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
電話：四三三八八二

訂內國 三個月十二期六個月廿四期
航空掛號：七萬五千五百元
航空掛號：九萬九千元
航空掛號：十萬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給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一〇號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端木正：清華大學教員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錢鍾書：作家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學

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不得

准其人學之不妥

儲安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新聞報載該報十一月二十日南京專電：「專科以上學校學生開除後，必須呈報教育部，並由教育部通令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對此項開除學生，不得准其入學。此項規定，因日久不免忽視，現教育部已重申前令，飭令各專科以上學校今後應嚴格執行，絕不准通融，以整學風」。我們認為此事深有不妥，爰為文論述，並為青年學生呼籲。

一、學校開除學生，總不出下列兩種原因：或者認為該生學業太壞，不堪造就；或者認為該生品行不端，不堪訓誨。社會生活中不能沒有懲戒，超過了某種限度，自然應該予以懲罰。但是今日中國一般大學，關於課業及訓育的標準，並不一致。先說課業。有的學校學術水準高，有的學校學術水準低；有的學校功課嚴，有的學校功課寬；有的學校以學生有無特殊心得、是否能融會貫通來衡量學生的造詣，有的學校祇以機械的考試、學生是否能背熟筆記或教科書來決定學生的成績……在這種差別裏，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今日中國的一般大學之間，甲校與乙校之間，乙校與丙校之間，丙校與丁校之間，甲校與丁校之間，在學術水準及學生程度上，是有距離的。因之，在甲校或許是一個「低材生」，但這個在甲校不過是一個「低材生」的學生，可能轉到了丁校之後，却變成了丁校的「高材生」；至少，這個學生在甲校是被認為成績低劣者，他到了丁校後，不一定同樣被認為不堪造就。這一點，我相信無論教育部當局或一般供職教育界的人士，不致認為我們這種說法為無據。因之，在甲校因學業太壞而被開除的學生，他的實際程度，不一定比丁校的在校學生來得壞。但程度還不及這個甲校開除學生的丁校學生既然仍可在大學讀書，而程度比在丁校在校學生程度好的學生，反而因甲校之開除而不得轉入其他學校，永遠剝奪了就學的權利，我們認為這是不公道的。再說操行。今日中國一般大學，由於各校的歷史、環境、以及主持的人物的不同，在訓導方面，其標準和作風，也並不全國一致。有的學校採取嚴格管理制度，有的學校採取自由發展制；有的學校所希望培植的學生就是上課下課、按部就班的學生，有的學校所希望培植的學生就是有創造力有新理想的學生；有的學校對那些對於國家大事關懷熱心的活動學生，總是不甚放心，處處加以管束，有的學校則對於有領導力有活動力的學生，中心贊賞，處處予以鼓勵和指導……因此，同樣一個學生在甲校可能成為校方最願意的學生，但在乙校可能成為校方很賞識的學生；同時同樣一個行為，在甲校校方可能認為這個行為超越了常軌，破壞了本校的秩序，但在乙校校方，可能認為這個行為是無所謂的，可以原諒的。在這種差別之下，一個學生在甲校可能是一個「敗類」，但到了乙校可能變成一個「人才」；在甲校，他的才智這被埋沒，在乙校，他竟獲有機會發揮他的才幹。同時，一個學生，他的品行

，（包括他的思想、胆識、組織能力、服務精神等等），在甲校可能被認為不堪訓誨，而到了乙校可能就被認為後生可畏、大有作為。因之無論從學業或操行的觀點看，要使一個學生，被一個大學開除後，全國其他大學便不再准其入學，這是不合理的。教育的目的在發揮理性，理性的目的則為求合理，求公道。因之我們認為教育部規定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的學生，全國其他專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這一規定，與「教育」本身的意義，背道而馳。我們希望教育部對於這種規定，能重作考慮。

二、在從前君主時代，地方上出了一件命案，就成爲了一件「大事」，有司可以因此丟官甚或被劾職。共和以後，民命反而越來越不值錢了，試看今日，民命與蟻命，究有何異！在學校裏，情形亦正相仿。在我們做學生的時代，可能一年之中沒有一個學生記大過，兩年三年中沒有一個學生被開除；開除了一個學生，那就全校騷動，極端嚴重。可是現在，學校開除學生已是家常便飯，不僅如此，而且現在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集體開除」，一開除就是十幾個或幾十個；學生成了韭菜根，一刀切下去就是幾十根。我們不知道這還是教育的權威「漲價」了呢，還是學生的價格「貶值」了呢？從前開除一個學生那樣鄭重，現在開除一個學生甚至幾十個學生這樣輕易，難道現在的學生，無論就學業的原因或品行方面的原因，真的那樣不堪造就嗎？假如說真的學業不行，爲什麼不在錄取的時候，將錄取的標準提高？假如說品行不端，然而各校訓導，平時對於學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究竟有沒有切實的指導。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新教育，名爲德智體三育並重，但體育不過做到開運動會，德育不過做到上紀念週。現在的學生，伙食這樣壞，有的學校十幾個人或幾十個人合住一間宿舍，基本的營養、空氣、日光都不够，還講得上什麼體育。要學生對政府忙的時候，如發動青年從軍等類，於是把學生大大捧一陣，學生要對國事有所表示，而不利於政府時，便把學生大大打一陣，這還講得上什麼德育。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新教育，大體上說來，不過是一種「書本教育」而已。按時上課就不扣分數，考滿六十分算及格，讀完多少學分升級，讀完四年拿到文憑。請問今日中國有幾個大學能注意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大學，比較有一種優良的傳統，學生沐浴在這種傳統裏，經過四年的薰陶，使他在做人做事上漸漸地得到一種正常的訓練；或者一個學生幸運地親近了一位優良的教師，受了他的影響，在性格上漸漸定型。但就整個中國的高等教育看，這種情形是佔極少數的。（這也就近似牛津導師制的精神。中國有許多人都嚮往這種導師制，後來教育部也規定各大學設立導師，但是中國大學裏的導師是「帶兵式」的，或者「保甲長式」的，凡是教師都是導師，每個導師帶上幾十個學生。不說在各種條件上根本無行「導師制」的可能，因之有導師而不知其所屬的學生有多少者，學生經

年猶不知其導師爲何人者，就是中國導師制的真正目的，亦不過是喚醒導師督管幾個學生，不要他們亂惹是非，鬧出亂子。所以結果中國大學裏的導師制是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於一般大學裏，除了上課、考試、分數、文憑外，還有什麼做人做事的訓練？一年復一年，墨守陳規，一批一批的畢業，糟蹋了青年的生命，糟蹋了國家的光陰。現在許多學校，這樣容易地開除學生，可是學校當局是否已經盡了「教」與「育」的責任？在目前這種教育制度之下，大學的主持人，縱然有這方面的理想，但事實上又是否能夠有所作爲，貫徹他們在這方面的理想？同時政府當局所行所爲，又是否能夠激發青年向上，能使青年身心安定？大環境惡劣如此，却希望學生乖乖如彼，其可得乎？青年容有錯誤，也當網開一面，讓他有條路走。越是開除學生容易，越不能實行一校開除他校不收的辦法。這種一校開除他校不收的辦法，是迫人墮落，迫人自殺，迫人走險，其結果與教育的本義完全相反；所以我們對於教育部這個規定，不能贊同。

三、但是教育部爲什麼要有這種規定，而且認爲此項規定，日久不免忽視，又要重申前令，飭令各校嚴格執行，絕不通融，以肅學風？假如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的學術水準和訓導作風都是一致的，則施行這個統一的辦法，猶有可說。但事實並非如此，在事實上也不可能如此。此事教育部非不知之，但仍有此種規定，而且重申前令者，據我們的觀察，其動機不是教育的，恐怕仍然是政治的。政府顯然企圖用這種嚴峻的措置，以壓制對於現實日益不滿的學生情緒，希望學生祇管書本，不管國家。我們認爲政府用這種嚴峻的手段來對付有熱血而無憑藉的學生是不公道的。而且在原則上，我們反對政府用一切以政治控制爲出發點的辦法來控制教育。政府應當讓大學學生在學術上自由發展，在思想上自由發展，在公共生活的訓練上自由發展，祇要這種發展是合理的，合法的。我們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樣保守消沉，我們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樣穩定謹慎，青年人可貴的就是那一股活力，這種活力就是國家的活力。沒有活力的國家是一個死的國家，沒有活力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社會。政府應當自疚自省，盡量刷新政治，締造一種光明而有朝氣的社會風氣，使一般純潔而有理想的青年在這種有光明有朝氣的大環境下，潛移默化，培養成爲建國的良才。我們對於年來各大學學生的活動，素極注意，對於各大學學生自治會競選這一類事情，亦不惜篇幅詳加報導，這就因爲我們認爲：今日這一批青年在這種校內活動中所受的民主的訓練，與二十年以後中國政治的趨向大有關係；歷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務就在要能預見每一個社會現象它在日後所可能發生的社會影響。我們衷心希望政府當局能創造一種新的風氣，以這種新的風氣來積極地激發青年的抱負，薰陶青年的和操守，而不要單在消極方面以種種方法來限制青年的活動，削弱他們的活力。

十二月五日

敬答樊弘先生

張東蓀

在觀察三卷十四期上拜讀了樊弘先生的大文，雖然是把我與梁漱溟先生拿來併論，但我個人願意把這件分開。我本來決定在最近寫一本書，在未寫完以前，不做客篇文章，不過對於樊先生這篇文章却不能不答復。其故因為樊先生對於我似乎是完全誤會了。何以知之呢？因為樊先生引用我的話似乎都是從梁先生所引用的之中轉引下來的。我疑心樊先生沒有拿我的原文之出處從其前後左右來通觀一下，而僅就斷章取義來加以解釋。所以本文分兩段。第一段可以說是一個辯正，即說明樊先生對我的認定是無根的。第二段乃是藉此說明我的意思，以便與樊先生作進一步的商榷。

首先我要聲明的是：我決不是主張採取儒家的無道哲學。我更沒有主張過甚麼通儒主政之說。不但現在沒有，並且從來也沒有這樣說過。一個主張民主的人不會把政治專建立在於一種人之上。以通儒為統治者，這是樊先生硬替我安置上去的。不但我從來沒有想到，並且我連作夢亦沒有夢到。這里只是我的辯答，却不關梁先生的事。至于他究竟是否如此主張，應由他來說明，我無權替他解釋。現在既把梁先生一方面除外了，則樊先生對我的辯駁可以說是變為無的放矢。

其次，我與樊先生恐怕有一個根本差異點，不在於主張的內容而在主張的態度。我以為一種政治理想由於人們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實現，這是一件事。而這個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類幸福，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當然不可分，但為了研究便利計，却不能不分開。于是在思想上便有兩派：一派只注重現實；另一派只够談理想。注重現實的以為一切都是由事實推演而成。高談理想的以為必如此如此方算為好，其弊在於絕塵而奔。但只注重現實亦無由以說明何以會有進化。因為進步總是變現狀而為較好於現狀的。這兩個狀態如鴉于樟端，在我看來，皆有毛病。所以我以為只有如何由現實推理想，又由理想提高現實，二者互相作用以向前進而已。根據這一點，我們只能說在這留于農業中的中國人因為對於民主不感到迫切的需要，未即全體努力去推動他，却不能說中國人不認識民主是一個好東西。我相信即鄉下老百姓，雖不識字，然而苟有人澈底告訴以民主的道理，如何是自由，如何是平等，他們必定會

明白民主比專制好。這正等于一個未受教育的人，如果能教以加減，他自然亦會算出二加二等于四來一樣。所以需要民主與認識民主並不完全一樣。樊先生說中國固于農業經濟，尚未突破，故無由使民主實現。這是大家無甚異議的。但這却決不包括說中國人不能認識民主是一個好東西。

所以我們還不能說農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隨資本制度而有的。我個人對於民主的看法是分兩種：一是把民主只認為是一個理想，一個原則。一是把他當作一種制度。制度當然是由理想而模製的，但實際上因為情形不同，不但總和理想相差，並且各地因環境而有不同的實現。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憑空而來，當然有種種因素與影響，現在不可細加討論。這兩種雖不完全分開，然而却不可完全混為一談。根據這一點則我個人始終相信民主主義如要澈底，終形成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乃是民主主義的必然涵義。關於理論方面似乎不應該有爭論。

問題只在于中國這個現實，如何嵌入于這個理想。樊先生提出集體勞動，在大體上本和我的主張並不相遠。不過我更向細微的方面來看。樊先生所謂集體主義却是我所謂社會主義。但今天中國的真問題是如何在中國的這樣國情上使這樣理想得實現幾分。老實說，樊先生的集體主義百分之百的在中國今天實行乃是不可可能的。外的條件有困難不必說了，內的條件亦不夠，更不可勉強，明眼人自知之，不必細說。這裏只是 imperfect Collectivism 或 partial Socialism。這個前提如果樊先生承認了，則問題便在這個部分或不完全的是在何處劃界。好像給病人吃藥一樣。我們既不完全抄人家現成的藥方，則對於人家的藥方的如何加減便成了問題。即應該加上一些甚麼藥；同時減輕一些那滋味藥等等的問題。老實說，今天中國非但不能照抄蘇聯的藥方，並且亦不能照抄英國的藥方。在此乃有兩方面：一即病人本身的體質；二即藥方本身的分量。體質有變化，分量可增減。二者相連即都會生出不同來。如果樊先生亦承認此點，則我說的「集合許多精通中西文化的人討論一個為中國而設的制度」便有了根據。樊先生因此乃誤會為請通儒作統治者，真可謂誤會到一萬八千里遠了。須知一個制度所以能實現，必須在這個制度下的人們各得其所；如果專靠統治階

級少數人來維持則可以說這個制度沒有生根。民國以來所有變法（如憲法與黨治）皆未生根，即由于此。我雖不肯，何致仍主張用通儒來做統治者硬要維持不生根的制度呢？所以以為樊先生這種誤會是「莫須有」或可說有些近情理。至于樊先生說，擬訂出來的制度亦不過和中山先生的一樣，我以為更是擬于不倫。老實說，一個制度的擬定是一件事，而其實現又是一件事。我在上文說過，欲使其實現必須使人們各各都感到滿足，或相當滿足，尤其在經濟方面。但是這些感到滿足的全體人民却不能每個人都來擬定制度，上文說到英國，須知英國所以不學蘇聯；就是因為他另有一個比較上生根的制度；我相信資本主義必變，美國將來亦會走上社會主義，但必又另有美國的樣式。如果我們能够照抄人家的制度，當然可以省事，無如不能。所以中國有其特殊的地方，毫不足怪，我與樊先生意見不同的地方，或許就在此罷？

總之，我與樊先生根本上可以說沒有兩樣，只是我看得複雜些罷了。並且我願意告訴樊先生：如果實際投身下去做這樣的工作，根據其處處實際上的教訓，必定會感覺到複雜；決不會以為就是這樣簡單的。姑舉一例，如土地再分配，農民仍是從私有的觀點來歡迎的，而真要增加生產則非集體耕種不可。此事便不像分田那樣容易了解與接受了。所以問題愈到深處，愈離簡單為遠。

（十二月三日寫）

寫完以後，再願補述一點：即關於工業化的。我以為中國終須向着工

業化而走，否則無以提高一班人民生活水平。問題不在要不要工業化，而在如何使其實現。對於這個前提，恐怕我與樊先生並無不同。只是好像樊先生以為農業是第一階段，由資本主義而始變為工業化是第二階段，他所說的集體勞動是第三階段。由第一階段可以一躍就到第三階段。我亦承認中國今天走以前英美資本主義的老路是困難萬狀的，但我却以為即使採用集體勞動的制度而須再向工業化推進。所以工業化不是第二階段，不可中間略過。今天的問題只是到工業化的路塗之選擇。提到工業即須提到機器，今天的蘇聯雖全力對抗美國，而仍想買他的機器。可見問題複雜，但無法解決。用集體勞動制來達到工業化，當然是很好。不過倘使「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亦不見得就是不好。樊先生是經濟學專家，當然比我知道更多。如果樊先生承認這一點，則必亦不能不承認研究到詳細具體的計畫時必須要有深通此道的人。恐怕樊先生本人亦就是要負責的責任之一人。並且在文化思想等方面以與經濟配合，又恐怕不僅是經濟學的人就够了的了。總之，今天不是採用那一類的藥方之爭，（無論如何總是民主兼包社會主義）乃是對於這個藥方內容如何加減折衷與其輕重界限之問題。以上所說依然不能盡意。但在此「文字無靈」的時代，實在不想多說。樊先生如蒙不棄，最好賜函，作文字交，以免在雜誌上再有答辯。好在現在的問題早已超出說話以外了。

（四日補）

中國能永久中立化麼？

端木正

附帶討論朝鮮永久中立問題

一月二日上海出版的民主論壇第二卷第九期發表了宋文明君「中國永久中立論」的論述，這是一篇簡潔有力的論辯，想為中國未來國策立一基本的新原則，而將中國「急速從火坑中拔出」。「永久中立政策」，從宋先生看來，是一劑萬靈藥，「也就是救國政策，救民政策，和救世界政策。」在文前，大題目之下，還有兩行頗覺自負的引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真為也。知其不可而為之，是真實也。」作者立論的心情是很容易了解的，也是無可批評的

這篇論述的主旨，已很明顯。首先，作者肯定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雅爾達協定將中國捲入美蘇對壘的火線上。「今天要想擺脫這種命運，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立刻宣佈中國永久中立，把中國從兩大夾縫中，從世界糾紛中，根本解脫出來。」然而作者對自己所用的「永久中立」「永久中立政策」或「世界永久中立地帶」等用語的確切意義，並不能把握，作者只以模糊的概念，解決最複雜而微妙的實際問題。這一問題是多方面的，涉及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還有法條的問題，「世界永久中立地帶」是不是「立刻宣佈」就可

以成立的？假如如此簡單，有如此輕而易舉的高靈藥，那世界未免太愚蠢，讓宋先生作了先知！

任何國家，在不違反國際法的範圍內，本有決定自己外交政策的絕對自由。假如一國決定永不參加任何國際戰爭，或不參加可能發生的特定戰爭，或不從事某一類的戰爭，那是該國自己的事。但維持這種政策，和「變成世界永久中立地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問題。前者是可以「立刻宣佈」的，後者並不如如此簡單。宋文明君原文的意義顯然包含後者，將中國變為「永久中立國」。（宋君並未用這個名詞，而他所用「永久中立地帶」和「永久中立國」的意義，本不盡同。一個國家可以不永久中立化，其國內一部份地帶，因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或慈善的原因，也可能有局部永久中立化；但宋君通篇指全中國而言，當然就是指「永久中立國」而言。）宋君概略地敘述永久中立化以後的情況，並未舉例，現在世界上只有一個永久中立國，就是為人熟知的瑞士。而宋君理想中的中國也不外「瑞士型」的永久中立化。我想這點解釋是合理的補充，不致有傷宋君立論的本意。

世界上永久中立國不止瑞士一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還有比利時和盧森堡兩國，以及其他一些並不永久的中立國。比利時自一八三一年獨立起，一八一四年歐戰發生，被德國侵略，有八十四年的永久中立；盧森堡大公國自一八六七年脫離德意志聯邦起，到一九一四年永久中立被破壞，也有四十八年的太平歲月。瑞士的歷史最久，從一八一五年，維也納公會列強同意瑞士永久中立化，經該國接受而成立，至今一百三十三之久，經歐洲多少大戰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其中立始終維持不墜，簡直是國際政治中一大奇蹟。然而瑞士有此類似奇蹟的紀錄，以及此利時和盧森堡的一度享受永久中立之福，是有其個別歷史條件造成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在均勢和歐洲協調的支配下，是比較有和平的時代，盧森堡那四十八年更顯明的是寄托在俾斯麥武裝和平下而存在。歐洲那時並不是兩強對峙的時代，而是法、普、奧、俄、（也可算上前期的西班牙，後期的意大利，）及海上大不列顛並峙的時代。永久中立國便是這均勢下的緩衝國。然而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德對立之勢已成，夾在兩強之間的比、盧兩國，就難以維持其中立了。瑞士的地理條件可謂得天独厚，居歐陸之脊，為衆水之源，真有高屋建瓴之勢；而又處德意志，奧匈帝國，法蘭西和意大利四強之間，均勢之維持也易，其造成長期和平狀態，是很偶然，也極不偶然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從客觀條件看，國際政治的形勢是否產生緩衝國的可能，是考慮建立永久中立的先決條件之一。

從國內政治的要件看，欲建永久中立之國，必先有永久中立之民。瑞士是多民族的國家，然而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風靡一世時，她並沒有分裂為三個以上的國家，各自依附外國，認自己的乾爸爸。因為能團結，所以能民主，她底民主也在世界政治制度史算一奇蹟。她底寬容不止及在本國人民，全歐洲的紛歧錯雜的思想都在那裏滋長，許多犯上作亂的團體借地開會，我們都還記得，一九一七年列強從那裏回到俄羅斯。因為民主，內政可以自行解決，不必從國際戰爭中求外援，假如瑞士多的是哭秦庭的申包胥，借清兵的吳三桂，那永久中立也早就壽終正寢了。這一項條件，是國內事務性質，雖說現在國際影響無孔不入，但總還是自己可以相當作主的事。這裏就不能全推之天命，有人謀的因素存在餘地。

除了人的因素，其他立國條件也有關係。永久中立國既是緩衝國性質，必在國際間無足輕重之處，所以此中皆是弱而小之國。至若小而強，或弱而大，雖想潔身世外，其奈人不我許。尤以弱而大者最可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九一九年前的土耳其大帝國是此類國家。不到百年，把地跨歐亞非三洲的病夫帝國，剩下半島之地，至今猶未完全死心，列強之爭霸戰中，這類國家正是犧牲的對象。比利時本來守志安貧，到了二十世紀，吞下了大殖民地剛果，第一次大戰中，盟邦英法念其當初抵抗有功，併肩作戰，便很恭維他。當戰爭結束之際，國際地位之高，僅次於列強而已，於是結盟強法，放棄永久中立。時移勢異，到一九三六年，比王又想舊調重彈，為時已完，今非昔「比」了。從國勢看來，要想恰如其份，作一永久中立國，可見並不容易，大有一分也不能增減之勢。

具備了政治條件，還有法律條件也得滿足。從本國永久中立政策「變成世界永久中立地帶」，關鍵在此。一國儘可「立刻宣佈永久中立政策」，假如不能得到別國尊重，也是枉然。如何使其他國家都尊重或承認？從歷史先例看，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協議，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歐洲協調的列強行動，就代表國際社會。瑞士，比利時和盧森堡的水久中立都是列強一致同意承認的，承認不足，還要有列強肯出面保證，集體保證或個別保證。一九一四年英國對德國宣戰就為了德國破壞比利時永久中立，英國為履行條約的義務，盡保證之責，不惜一戰。當然，不從純粹法律觀點看，實際上的理由，自然是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利益不一致當初也不肯承擔保證。建立一永久中立國，並非僅為該國和平安全設想，也必與國際大勢的要求相符始可。自行宣告永久中立，有一九一八年冰島國之前例在，法律上講無効，別國不承認，更不保證，等於未宣佈

永久中立國既永不受別國攻擊，享受權利也要盡義務。外交政策受此根本限制，主動不起來，只得處處防備列強指責，永久中立，每事不偏袒，談何容易。一旦法律地位確定，要想自己放棄，也是違法，除非得當初承認及保證各國同意。永久中立國除自衛外，不得用兵，（盧森堡甚至除警察外，不得有軍隊）也不能締結攻守同盟條約，連關稅同盟都有問題。一九〇〇年為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對華武裝干涉，比利時躍躍欲試，德國便以其為永久中立國，不得出兵，否則就成了九國聯軍了。

因為有這些複雜情形，所以永久中立國日見其少，至今只剩下瑞士一國，碩果僅存。就整個大勢講，本世紀來有減無增。嘗試的努力很多，有的根本未成功，有的知難而退。首次世界大戰後，波羅的海三小國想永久中立化，只得蘇俄同意，不足成立。一九三四年美國國會通過菲律賓獨立案中，附帶請總統在菲獨立後，與各國進行談判使之永久中立化，經過一次大戰，此話也無人重提了。

永久中立國所以不合潮流者，更有基本原因在。今日的世界，在經過兩次慘不堪言的大戰後，國際社會休戚相關之認識已經普遍，用聯合國憲章序言中的話：「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隣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這種精神和永久中立國是不相容的，一是消極，一是積極，一則兼善天下，一則獨善其身。在國聯時代，盧森堡和瑞士之參加，還可有保留。現在聯合國已斷不容永久中立國入會，瑞士所以至今未聲請入會者，原因在此。她只能和安道耳、聖馬力諾、摩納哥、梵蒂岡等微小國家同立在大國際社會之外。因為永久中立國不能履行憲章所賦義務（第四條一），也不能協助「對於聯合國依本章規定而採取之行動」（第二條五）。今後任何聯合國會員國要想永久中立化，只有退會之一途。

有如上述，永久中立國是不易為，不宜為，也不能為的。中國的情形尤然。今天的世界大勢誠然是美蘇對立的形勢，兩大之間也有一大串緩衝地帶，這些地帶，却都還沒有具備永久中立化的條件。緩衝國是世界政治大舞台的小配角，列強是少數主角，圍繞著列強，展開戰爭與和平的演出。中國今日的處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不折不扣的五強之一。中國如果不能積極地成為美蘇間的橋樑，也決不可能消極地成為美蘇間的隔離物；政治現象，正和自然現象一樣，是不容有真空地帶的。

關於國內政治所該具備的條件，不加檢討自明；何況中國外交政策的傳統

法實，就是「以夷制夷」。到最近還可以聽到「你不理我，我就投到他底懷抱」的高論。一時之中立且不易，永久之中立更不待言。由於這種傳統政策的結果，中國的外交一向是孤立的，不在任何世界政治集團之內。雖然今天想「擇主而事」的頗不乏其人，無奈至今仍停留在單相思階段，倒不如前敵國日本已經進了國內。宋文明先生大作最後也提到美蘇的態度，已經說明美蘇都未必願中國參戰，但不要中國多戰，和願中國永久中立化，其間距離甚遠。所以法律的要件，也無從滿足。

最後，關於聯合國的關係，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之一，有特權，其有特殊責任。中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士想都不願放棄此項特權，假如宋文明先生考慮到這一點，也未必願中國永久中立化；設想當代巨強之一，忽而擺脫一切權利責任，獨善其身起來，那又是神祕的奇蹟了。

永久中立化既不可能，是否中國就命定要捲入未來的世界大戰中？當然不然。一國儘可維持長遠的中立政策，而不必考慮永久中立。美國從開國以來，自華盛頓去職演詞以來，就保持不參與歐洲糾紛的國策，形成傳統的中立政策，而並不考慮永久中立。對內立法機關有常設的中立法規，限制行政部門的動向，指示國民應守的本分；對外維護國際法所賦予的中立權利，必要時不惜以戰爭來維護。國際法上中立法的發展頗多美國的實績。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北歐奧斯陸集團各國中立法，尤其是美國國內討論修改中立法的爭執，想猶在世人記憶之中。美國並未能以國內立法避免戰爭，那是法律以外的原因，這套辦法仍自有其價值。

國內中立法以外，對外中立條約也是一個辦法。此類條約或為個別的雙邊的，或為集體的多邊的。兩次大戰之間的蘇聯，恐帝國主義包圍，願集體安全成立，以求建一個國內社會主義，其外交政策目的只在自保，不求侵略，所以個別地和其他各國訂立了許多互不侵犯條約或中立條約。（一九三七年與中國，一九四一年與日本，皆可為例）。這類條約個別簽訂，而自成體系，明顯地表示一國外交的方針。以集體的多邊的條約，涉及尊重或保證中立的，可以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第六條為例，原文如下？

「第六條 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協定於發生戰事時，中國如不参加戰事，應完全尊重中國中立之權利。中國聲明中國於中立時，遵守各項中立之義務」。

在九國公約中，此條訂立後並無多大影響，其內容本為國際法既定原則之重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此條所採的立場，此條是中國自己提出的，提出的

動機有其歷史背景。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一九一四年歐戰日本攻取德租借地青島，都是在中國領土作戰，中國將自己的領土劃出一部分讓交戰國作戰，以求作戰區域以外的中立，還不可得，未免太慘。所以中國要求列強尊重中國中立權利；九國公約以後，太平洋均勢一時得保，直到九一八事變，而列強之間也無戰爭，此條也未經試驗。就條文言，中國並未得到較國際法已有者更多的保障；就經驗言，則一國若立弱點太多，參戰固不易言，中立又何足恃，委曲未必能求全。華府會議是在對華有利的國際均勢下舉行的，今而後，中國即再想有如此條約，恐不可復得。

年來國人恐浩劫之將臨，作未雨之綢繆，以中立自保之念也是很自然的。宋君永久中立的希望代表不少善良心腸的國人。目下中國既絕不可能永久中立化，國內立法的控制也極少希望，試想我們「萬能的政府」，如何能受讓事機關事先設立的限制。今天的國際大勢，中國在在聯合國的地位和責任，也不容中國再提出國際條約的保障。比較可行的，只有和隣國各別訂立中立條約或互不侵犯條約，但說明不得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和精神衝突。這是惟一比較可行的辦法。總之，中國如果將來必以中立自保，還得在中立以外設法，要先在國內政治上建立可以中立的形勢，然後才有「立刻宣佈」中立政策的可能。

以永久中立為救國救民的萬應靈膏，絕不止宋文明先生一人。朝鮮革命家李宗（忠）橫先生，在十月十五日英議會訪華團抵北平時，曾訪晤與蒙助爵，呈遞備忘錄一件，提出對朝鮮問題的主張，其中第五項就是：請英國提出聯合國大會，承認韓國為遠東之永久中立國。（以上記載見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這種議論也極值得同情。關於韓國永久中立化的擬議，倒並不太新奇，自從韓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國以來，始終有此種醞釀。較之中國，當然韓國所具備永久中立化的條件要多些。從國際政治的演變看來，韓國有兩次機會有

此可能，但都稍縱即逝，一去不復返了。一是甲午戰爭之前，尤其是甲申事變前後，日本沒有戰勝中國，其國內輿論界也有過此項論調，以防帝俄南下，國際間也不乏作如此看法者，當時在遠東，俄之南下尚未及此，中國仍不失大國，日本之實力不顯，美、德、法、英、意、奧、匈各強國的利害那不密切，局勢大有可為。第二次機會就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會議，假定以後在德黑蘭會議能得蘇聯同意。其向以未成功，這裏不追細說。

可注意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氏最近討論朝鮮問題時，說若不能使之成遠東斯堪的那維亞，將成遠東巴爾幹，而語不及瑞士。此話頗有道理。就地理形勢論，很明顯地，朝鮮是個半島。半島和島國近似，是和全世界有海岸綫國家為鄰的。（空運時代，更甚於此，此說也不免陳腐了）。故今日朝鮮問題已不止是中日蘇三國間的問題。提起斯堪的那維亞各國，也曾有過永久中立化的企圖，為時在四十年前，都未成功。其中瑞典兩次大戰都守中立，已事實上近此，但還不能造成法律地位。巴爾幹是歐洲火藥庫，其中有一小國阿爾巴尼亞，在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結束時獨立，取得永久中立地位，不過一年，歐戰爆發，就無疾而終了。何以巴爾幹各國自己，或歐洲列強，不將火藥庫變成永久中立的世外桃源？此中關係大堪思索，前文也已論及。世間多少小邦，自古以來，敵弱縱橫，研殺不絕，「百年苦樂由他人」，安得個個皆似瑞士，得享一世紀以上太平歲月，此中實「各有因緣莫羨人」，非可強致。

韓國之不能永久中立化，衡以前文所述，皆極明顯，請英國提出聯合國大會未始不是一個辦法，聯合國固不容永久中立國為會員，但並非不可為國際和平設立此項地位。寄語我唇齒之邦有心之士，國家命運終須本國人民自行解決，國際的保障制度也須本國先具備某些必要條件，否則皆是空談，無補大局。願共勉之。

十一月廿八日清華園

共和黨援華運動

（紐約通信）

楊剛

自從亨利魯斯發表了蔣立特對華放款三年計劃以來，久經瀰漫的共和黨或中國保如職的傳聞越來越表面化了。在這一個半月之間，關於中國問題，熱鬧

處全在共和黨要人方面。參院領袖范登堡已經發吼了兩次。衆院中國牧師裘德跟馬歇爾先生吵紅了臉。參院威權塔夫特與衆院領袖馬丁都變成了中國的保衛者。明年總統候選人的一社威省長，尤不能不聽魯斯先生的話，出來為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擔憂，而大實行政當局不長眼睛，不講良心，把中國送給蘇聯。

除這些外，天天在無線電上嚷着應儘量蘇聯和共產黨的共和黨要角們也頗對中國問題發力氣。今天早上衆院外委會爲中國提出了六千萬之數，暗示明年一月正式會議時，中國還有希望再得一點。魯斯先生既然能够組織和支持意大利的底加斯卜里政府，他對於中國問題的權力，在美國當然不是一件小事。爲獨立特一篇文章，他登了六百家報紙的整版廣告。在時報和論壇報上的整版廣告，據說是每家三千元一天。一篇文章廣告費總起來不下幾十萬美元。除此之外，他在共和黨領袖們中間的活動費宣傳費也不知要花多少。幸而有魯斯先生，降生於自己國土上的中國人，假如從此能見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真不知怎樣才能報償這位財主所投的這一筆大資本呢。

魯斯先生這一次的作風與過去稍有不同。過去他對於中國問題是處在輿論界的地位上。他相信在美國有錢就有輿論，有輿論就有政策。所以重點似乎是放在寫文章方面，其次才是政策製造者方面的活動。大體的說，有錢就有輿論，這個信仰在美國是有根據的。所以魯斯先生是有堅實信仰的人。毛病出在錢和輿論并不是以同樣速度向同一方向進展的東西。輿論雖有極可能跟錢走，有時它太慢了，常常緩不濟急。所以這一次魯斯先生翻然改圖。一面先後請浦立特和麥德爾兩先生到中國去，以作製定政策的地方根據，一面在共和黨首要中間，提出以中國問題作爲明年黨爭的中心問題之一。這樣，他這次是以共和黨政策製造者及推動者的模樣在活動。在輿論方面好像他至少是不十分在意了。爲了生活畫報的登動性，他不惜違反自己的政策，在最近一期生活上，把中國政府在天津附近決運河堤，水淹三百方英里農莊以阻止共軍的圖片發表出來。還要發出政府用軍隊阻止鄉民搶修。不管他的按語怎樣，他難道不知道美國一般人現在的對華看法麼？即便承認他的心全然不在中國政府身上，但從他們共和黨政策着眼，也覺得邏輯上莫明其妙。

二

杜威省長以默契的總統候選人資格就中國問題發表了兩次話。十一月廿四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演辭應看成是共和黨對民主黨所投的一通戰書。在那篇演詞中，他巧妙的把中國說成好像是美國的親骨肉一樣，「亞洲和西歐」是美國的「兩條長了爛疔的腿，不能只醫治一條，而把另一條丟着不管」。他說「美國已經把中國從一個壓迫者（日本）救出來，不能把她再交給另一個」。他說美國是爲了「保衛中國的自由」「保衛中國的獨立」才和日本打仗。他說雖然中國的形勢甚爲緊張，但只要美國幫忙，「中國人民偉大的忠忱（他

沒有說是對誰的，大約是對美國）還可以動員起來」。可是民主黨的糊塗中國政策，竟把這個要人保衛的中國慢慢的弄到「蘇聯和他的友軍」手上去了。

這位美國政客應付國內一些問題也許相當拿手，但是對於中國問題採姆一樣的姿態，好像這篇東西只有美國人才會讀到，中國人是不會看見的一樣。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受過外來者征服，近百年來也會在東西洋人面前低過頭。這便得一些肥頭大腦，不懂自己國外人情的洋人把中國看成地理名詞，看成是受價了別人「保衛」，永遠是在異民族之間被救來救去，交來交去的一塊區域。中國人民對於祖國深厚的如赤子對母親一樣的愛與尊崇，非但這類人不能想像，即有些中國通也不十分明白。中國人民餓死凍死，心在祖國。華僑們在國外保持沉默的自尊心，胼手胝足受盡痛苦要寄錢回祖國去，只希望祖國堅強壯大，不肯只圖自己在外國的發展。這種民族感情，一方面是傳統的家國主義所產生，另一方面它却是中國人民不滅的德性。專講個人主義的西方人很難理解。在杜威先生心目中，希臘既然受得了美國的「保衛」，受過了「美國保衛」的中國人當然更不用說。有這樣心理的人若掌握美國政策，將來無論中國有怎樣的政府上台，都會覺得這方面事情難辦的。

從美國情形看這問題又比較複雜一些。在這裏外交和內政聯在一起，黨爭和國是聯在一起，而兩黨立場混淆不明。假如我們大膽的說，從現在起，到明年秋選爲止，把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發動的出發點多多少少歸之於黨爭，大致不會十分錯。到現在爲止，美國黨爭雖甚利害，然在所爭執的焦點何在，却是一般的糊塗。兩年以前，人們能够大致感到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共和黨會勝利。現在却沒有這樣感覺。其中原因甚多，但最大的原因是兩黨都揀同一政綱政策，并且在極小的差別之下，（如在華萊士及美國進步公民會壓力之下，民主黨不得不有時對工人問題上作姿態，而共和黨不理。）兩黨差不多都揀同樣階層的選民。非但世界政策如此，即內政問題如工人政策、房屋政策、反壟斷政策、物價政策等等，莫不可以作一例看。大致上不能分別界限，兩黨深知。同時社會分野中又沒有一個確定的力量起來，這使黨派在政策上不能不採相異的道路。因此美國的政爭就自然流於繁瑣的鈞心鬥角，找小麻煩，爭成功，擲失敗。回復到新政以前的狀態。

在現在情況下，共和黨的形勢不算有把握。去年秋選他們用反物價控制把民主黨打下去，同時他們儘量利用了他們領導的所謂兩黨世界政策。開年以來，民主黨在這兩方面都比他們跑得更起勁。現在，兩黨世界政策的名稱久已爲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方案代替了。共和黨雖可以爭說這些東西都是他們領頭，

特別是范登堡和達勒士的主張，無奈執行這些東西的總是杜魯門和馬歇爾，成續大有被別人搶去的危險。這還不算。另一宗麻煩是通貨膨脹問題。這東西本是誰都可以利用的。共和黨可以把通貨膨脹的失敗責任推到民主黨身上，說是因為行政機關在國外亂花錢的原故。而民主黨也可以往對方身上推，說是因為他們取消物價控制。無情的民主黨先發制人，在特別會議上，用撥歐的大帽子一壓，說為了制止通貨膨脹要行物價工資管制與配給制度。事實上要使馬歇爾方案的成功能有幾分之幾的把握，最低限度，在它的成功失敗判明之前，要使國內危機不致爆發，就非實行信用、物價、工資等管制與配給制度不可。但民主黨現在提出，却是明知共和黨不會通過物價管制。即使他們通過，那東西不窮完備，也不容易生效。民主黨因此叫共和黨一交跌進了茅坑，出來也臭，不出來也臭。不通過，通貨必繼續膨脹，也許僅能因信用稍受管制而慢一點。通過，有可能黑市與通貨膨脹並行。兩者都是明年算賬時的麻煩。假如他們索性將其通過，而明年把罪歸到提出來的民主黨，則他們背後的大老板們又不許可。煤油業、鋼鐵業、總商會、全美製造家協會……這些華爾街的王公都已經表示反對。

正當共和黨焦頭爛額之際，中國問題的形成真是如獲至寶。共和黨之運用中國問題，一如民主黨之運用物價管制問題。他們提出來的中國計劃，每年二億五千萬，給三四年，實際上和馬歇爾所提的頭十五個月三億元相差無幾。他們的看法是：反正你是要給錢的。我正當名分的提出來，若中國問題改善，是我之功；不善，只怪你拖得太久了，太不可救藥了。他們知道錢量太少，不能改善，明年好狠狠打一拳。這一下可算民主黨難以扭脫。

中國的命運被播在別人的黨爭裏，是非常可悲而且可怕的事。假如我們不能夠擺脫對於這些英雄好漢的倚賴，那麼我們將來還要變成美國黨爭的足球，在美國向來陰陽不定的政治季候下浮沉。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問題在這裏單純的是國內黨派問題。在國際關係上，在范登堡或者達勒士或者魯斯的眼光中，從現在起，倫敦會議失敗，與西德訂和約是歐洲政策應走的第一步。給中國少量的錢，但必須先說年年給，使那邊局面能拖幾年，是亞洲政策應走的第一步。因為中國局面必須能拖到一個時期。第二步是不是全球大打呢？我們不知道。但即使是范登堡眼前也不敢說要這樣來準備戰爭，同時他的西德和約計劃又在搖擺不定，得經過較長時期籌備，包括輿論方面，才能實現。

三

民主黨對於中國問題的苦衷，一言難盡。他們對於中國政府之關切，起碼不會比共和黨少。在世界關係中把歐洲和日本放在中國前面，也不是民主黨獨佔的觀念。兩黨在這些方面沒有根本不同。所不同者，民主黨以十幾年在朝黨的經驗，中間經過一場全球反法西斯戰爭，對於中國政治社會民情的複雜性，比共和黨多理解一點，作風上因此要避免打前鋒的姿態。試看近來關於馬歇爾方案非正式的討論中，共和黨主張寫下不許受惠國家繼續社會主義的條文，民主黨行政機關則期以為不可，因為會更加刺激歐洲反美情緒，且招本國一部人反對。事實自身的邏輯，原不用條文來保障。在兩個性質與政綱大致與相同的政黨之間，不同處只是經驗和有資與無資的問題。

從今年一月馬歇爾發表了關於中國問題的宣言以後，民主黨對於中國就採取了「游擊戰」的政策，換句話說，是沒有正面的政策。從那時候起，麥克阿瑟以日本作基地，中國做戰場的理論也就在醞釀半年之後，真的佔了優勢。中國既有戰場價值，就不能完全撤退，完全不理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既無遠東主要根據地的資格，也就無須爭全力支持中國政府。只要常常有一點半點東西去維持其還能是一個戰場就够了。

這情形持續到今年七月，看是越來越不行。中國局面在中國固嚴重，在華府的嚴重性至少也不下於在中國。在此地段，假如南京不守，中國這個戰場就要垮台。即使彼時不是中國共產黨專政，任何另一上台的政府其向美之心不可必。即使這個政府不站在蘇聯一邊，即使它講保境安民，站在中間，如六月以前自命為東西橋樑的法國政府，美國也就失去了滿洲，失去了西伯利亞的後門；失去了成都、西安、蘭州、迪化，失去了魁貝加爾湖的孔道（這是根據八月卅一日紐約世界電訊報）。因為中國政府若堅持中立，美國除了硬派軍隊佔領中國之外，無法弄蘇聯的後方（日本當然不够用）。這一着太麻煩了。得打完中國，才能打到蘇聯去。

是這樣一種考慮使魏德邁去中國。他的主要任務是考察中國戰場一般的以及各別區域的軍事形勢和對比力量。那時候的問題是：繼續過去的「游擊戰」呢？還是大幫特幫，起碼使政府能守住現有的區域？

從現在回看魏德邁回來後的種種跡象，我們可以說民主黨的對華政策只有一點地方還在遊疑，以援歐餘力來大幫中國政府的決策，倒是不下於共和黨。這點遊疑是究竟是否堅持一切美國援助都要美國監督，甚至於財政、經濟、工商業、軍事政策全由美國參預支配，像美國待希臘一樣。華盛頓有這樣一個流行的說法。說魏德邁此行對中國意見太壞，認為他所看見的比他所想像的壞

六十倍。他認為今後一切的做法，政、經、軍、財等方面，都非由美國直接參與，直接監督不可。要在中國設一美國總代表管這些事，而此人只對華盛頓負責。並且說他認為美國在中國的交涉對象，不必一定是某某個人，只要是能够產生效率，能與美國合作的人就可以支持上台。但國務院對於這種軍人見解頗不同意。認為大幫是必要，但美國露而監督則不可。因為中國與希臘不同。關於交涉對象之說美國認為不現實。共和黨方面如魯斯、如賽德、如在生活雜誌發表文章的蒲立特，則認為美國事實上需要去監督。中國人只講面子，只要面子上過得去，則監督也無妨。而關於交涉對象則以為萬無考慮改變之餘地。

民主黨行政機關對於中國的考慮和關切不能拿到表面上來。一方面是因為緊急援歐與馬歇爾方案牽制住了，另一方面是馬歇爾依然考慮美國與這個東西，最要緊的是以馬歇爾先生這樣軍事外交上幾乎是全能的統帥，對中國想不出有效的方法。中國不是西歐。經濟、政治都無西歐那種比較可靠的根基。中國又不是希臘。在希臘花了三億元，改組了她一個政府，情形反愈來愈壞。三片間還是不到一萬人的游擊隊，現在變成了近三萬人。因此，無論是馬歇爾方案的規模，抑或是杜魯門主義的規模，拿到中國去都會差勁。共和黨與魏德邁的主張都是杜魯門主義的規模。甚至於杜魯門總統選在一個月以前，也曾請馬歇爾重新發一個對華政策的聲明。馬歇爾則以為這是不聲不響，暗暗送東西的好，當然是要比以前送得多。

在黨爭方面，共和黨雖以為抓住了民主黨的大藪，衡量各種論點時，民主黨却也站得相當穩。左說它有理：它一貫地贊成有民主的、強大而獨立的中國。右也說它也有理：它從頭就支持中國政府在那裏花了幾十億元。而且，在杜威沒提出他的辦法來以前，馬歇爾已經說要給中國每月兩千萬元。到明年這問題之鬧大鬧小，一要看馬歇爾方案當時在歐洲進展的情形與歐洲政治分野上的變化。假如法國和義大利情況變化，馬歇爾方案的政治目標注定失敗，則中國問題跟齊也會鬧大。再要看明年中國的情況。無論大鬧小鬧，這問題總不過是波瀾而已，因為美國關心中國問題的人實在太少太少了。比起中國人對美國的興趣來，可說千分之一都不到。關心中國的人大都是到過中國的傳教士，這些人政治上與論上能發生作用者很少。其次則是中國通，其中包括教授、新聞記者和退職的外交官吏。也就是這些人形成現在美國對華輿論的中心。這些人和共和黨的看法很合不來。

四

就中國本身問題說 記者一向以為自己不要打，就不要靠別人。因為別人

總是一個不可知數。靠別人打內仗，情形就有些像把中幾萬萬人的生命押在一個自己管不著的、動搖的泰山上冒險。至於中國因此所受的侮辱和輕視倒是不消提了。

美國之不可靠不在於她想在那裏或者李濟琛之間有所選擇，當然更不在於國共之間有所選擇。這些都有很明白的答案。真實的原因是美國目前在中國的行動出發於一個政治的、消極的觀點，這個觀點沒有積極的經濟的利益作後盾。拆穿了說，這行動的出發點是除害——蘇聯和中共，而不是興利——投資利潤與商品市場。試看馬歇爾方案的種種做法，決定的要點還是興利為主，除害次之。眼前東西兩德佔領區的商約，西德與東歐的商約，乃至於西歐十六國將來在馬歇爾方案下與東歐通商的趨勢，都在政治上強烈的東西分裂主張下矛盾地進行就是證據。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利害之間還有餘隙，可供雙方週旋；另一方面也因為政治的害和經濟的利不是絕對針鋒相對的東西。這也就是封建國家可與資本主義國家並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能够並存的根本原因。即使歐洲法義情況變化，這情形也很難突然改變。明白的說，即使義大利明年選舉共黨上台，即使法國今冬發生內戰，第三次大戰也不是必然爆發。假如這個分析合乎事實，就知道一個政治的消極的觀點如何不足以使美國為中國拚命。中國現在是美國的負擔，無利可圖。美國在中國的行動，經濟上自然是負數，政治上的風數又不可必。在這樣情形之下，再加以她在全世界各方面的開銷，美國在中國方面之拖攏勸盤，迂迴遲慢，恐怕非在第三次大戰發生時不能改變。不過，這一實不可以隨便亂說，因為又是個不可知數。即使在短期間爆發，假如蘇聯不先派兵長驅南京，則美國還是先顧歐洲與中東，而不能即搞西伯利亞。但蘇聯為什麼放了歐洲，先弄南京呢？從這樣看，即使大戰爆發，中國所得之於美國者也不會比抗戰期間所得，或者現在所得，超過太多。主要重點依然不會超過於加強空軍，與訓練中國軍隊以外。因為到那個時候，美國的陸軍是不會十分够用的。而海軍在中國無太大用處。經濟上除軍費以外，美國能支持者會更少。

從種種方面看，共和黨援華運動對於中國的意義是很小的。除了中國案子在議會辯論中，更便利於民主黨議員抨擊，而有傷中國政府以外，它既不表示美國政策上今後將對於中國大熱心，也不足以根本改變美國民間對華的冷淡，與論方面能為這些人所動的尤少。雖然美國駐華新聞記者在此地一般的反共的空氣之下，在中國換了中國政府幾次罵之後，絕不再說中共好，也不再亂罵中國政府；雖然此地輿論家決不表示有所愛於中共，但是有一個觀點經過了多少年的迴蕩，現在是確定了，即亞洲是在空前絕後的民族社會革命浪潮中，這浪潮誰也不能阻止。這些輿論家希望中國政府能够是這種浪潮的領導者，但共產黨是否願意呢？

十一月二十六日 荷靈香島

我們訪問了斯大林

英工黨國會議員 K. Zilliacus

Stalin and All That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v. 1, 1947.

八個工黨議員 (Arthur Allen, Geoffrey Bing, A. J. Champion, Fred Lee, Ken Parkin, George Thomas, Henry White 及本文筆者) 的訪問斯大林於其 Sochi 消夏別墅，乃是他們從九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連續訪問了捷克、波蘭、南斯拉夫、和蘇聯各地後的最高峰。他們在這些地方訪問所得，都在這最後一次訪問中獲得了證實和解釋。

這次訪問的最重要意義是在它的時地：斯大林不常接見外國訪問者，據筆者所知，他在這所高加索山麓俯瞰黑海的別墅裏這會是第一次接見訪問者。並且，我們和斯大林二小時的晤談，乃選接着和莫洛托夫三小時的談話；兩次談話都坦白而友善。Alexander Werth 曾一針見血地對我們說過：「你們知道莫洛托夫為什麼願意爲了你們這羣後排的工黨議員而費掉三個小時？這是因爲蘇聯政府還沒有把工黨的英國認爲無足與語而予以棄絕。」

筆者認爲這正是關鍵所在。我們對任何人都先說明：我們並非官方代表，亦不是國會內或國會外任何團體或組織的代表，尤其不負有任何使命或權力。我們唯一足以引人注意之點是：我們很平均地足以代表國會裏工黨的橫斷面，包含廣闊的不同意見和有利的工會方面的多數。爲了這點緣由，我們絕不僅受到蘇聯的，尤其是其他三個東歐主要國家的接待。我們到處受到友善的歡迎，從總統、內閣總理等起，一直到工廠裏的工人和街頭的平民。他們對我們問無不答，知無不言。

斯大林對我們所爲陳言：他需要兩國間的友善和合作，得以通商條約的締結，和英蘇同盟的修正與加強爲基礎，筆者認爲我們中任何人都不能懷疑其非出於誠意。斯氏尤其強調地認爲：從蘇聯政府的觀點來看，現在的問題並非是在英國對於東方或西方兩者間的選擇；因爲他完全了解：英國必須與全世界貿易，特別與美國必須有密切的經濟與政治聯繫。但是俄國人却不解：英國爲了自己的和俄國的利益，爲什麼不能糾正他向美國一面倒的關係，而同時也和東歐——蘇聯在內——建立良好的貿易政治關係。

這個態度是有意義的。因爲，在我們訪問的旅程中，各國的國策計劃者如商業部長等會向我們指出：(甲)東歐的農業經濟正是工業英國的天然補充者

，因爲前者正需要輸出食糧和原料，而和後者所要輸出的機器和製成品相交換。(乙)東歐各國的計劃經濟乃旨在提高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和人民的生產力。這是說，他們可以逐漸增加輸出英國所需要的東西，同時也增加從英國的輸入。(丙)他們的計劃經濟是輕然獨立於美國資本主義——美國的債法所歡迎，因可加速他們計劃的完成，但是他們也並非必需此項借款，沒有了它，他們依然可以完成其計劃。所以，英國若能和他們互通有無，不僅將易於避免危機，並且將多少不受累於美國行將到來的經濟恐慌。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重述了我們在東歐各國所聽到的：英國希望這些國家能接受在貿易協定中具體指出他們所能交付的貨品，它們的數量和交付日期。他們會接受了這個條件，因爲他們正行着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但是他們需要交互條件。他們埋怨着：當他們向我們的政府提出這點時，我們貿易部的答覆常是：「抱歉得很，我們的辦法並非如此。這裏是我們企業者的名單，你們可以直接向他們接洽，看他們願意如何辦。」

這些國家的貿易和計劃當局所指出的另一點是：我們政府好像祇想締結「狹隘和舊式」的通商條約，而他們所希望的是較廣闊和長期的協定，足以配合雙方的整個計劃，而爲此後數年訂雙方的生產目標和輸出計畫。

最後，一個波蘭高級當局對我說：「現在的問題是誰吃得少，誰吃得少——波蘭人還是英國人。我們可以叫我們的人民在食糧方面忍受些不利，若是我們可以確切告訴他們所將從英國得到的交換品，以及雙方如何爲了互利而合作。」他又指出：這樣的合作不必限於兩國間，它更可擴及於區域性的多邊協定。俄國人講得沒有如此具體，但大體上是和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相同。

體更其地說：波蘭將於本年內供給我們三千萬個雞蛋，明年可以增加到五千萬個。在正常收穫下，他們還可輸出糖、小麥、和肉類。南斯拉夫在本季可以輸出四萬至五萬噸玉蜀黍，明年還希望增加，此外也能輸出小麥和肉類。捷克今年歉收，但仍能輸出糖。俄國今年提供一百萬噸穀類，明年一百五十萬噸，此後兩年每年三百萬噸，此外，又有二十五萬噸的魚蟹等，逐年遞加。這些國家都能生產木材。南斯拉夫今年能賣給我們煙草（筆者相信保加利亞也能），來代替美國的煙草。（下接十九頁）



政治年度總結賬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着寫此通信，已是十月初旬，距今年除夕，不過二十幾天了。今年這一年，真是不平凡的一年：由和戰而戰，由戰而和，由和而戰，由戰而和。在政府的立場說，可以說是做了幾件大事。本年年度開始後，張岳軍以試行「責任內閣」的姿態上台。當時政府當局，表示今年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吃、打、選」；第一件是物價，第二件是裁撤，第三件是國大代表和立委的選舉。到今天止，每一件事的發展，都深刻地受着客觀環境的牽制。現在時令已是一風雨凄其，草木零落，政治的形勢也正配合着時令，「我略四方，登覽廡所選」了粗略地看今年政治的成果：

軍事

東北地區，從龍式輝，杜聿明到陳辭修，其態勢始終是政協破裂前夕的態勢。不獨東北

戒嚴了好多天。這時山東地區的大軍還未回擊，西南的軍隊又連水不救近火，連首都這個神經中樞，都動盪不寧起來！說也可笑，神經過敏的有產或有權階級，近日來頗有「台灣路線」之說，可想見自相驚擾的程度了。

經濟

政府對今年經濟措施，第一是國民黨三中全會的經濟改革案，和全國經濟委員會所頒佈的經濟改革方案。那是一篇八股，把各方對經濟的觀點，都羅列進去，避開現實，高談闊論，在經濟界中，簡直未生影響！因為所保證的如發展生產事業，增加生產等等都落了空；而現實的市場反應，却是發行無法遏止，物價繼續上揚，枯竭的外匯無法增加，因此改定了外匯官價，隨市調整，以官價追隨黑市。可是問題又來了：第一是發行不斷增加，法幣隨時貶值，持有外匯、美鈔

黃金的人們，心理上總覺得財產是自己所有的安全，政府所給予的沒有保障，因此官價反為黑市促進的力量。第二是華商走私。儘管把羅卓英換了宋子文，依然堵不住港九的漏洞，並且更加甚走私商人的藉口，與特權階級在此處的方便。走私一天不在，官價外匯便一天不能保持住穩定的價格。這其間還有一個新矛盾。年來劉宋倒孔和宋張來，適足代表某一經濟集團與另一經濟集團力量的消長。宋孔是豪門資本，憑藉着國家金融團體其官銀資本網；現在的中央銀行主人，却是民間資本的代表。前者要統制，要打擊民間資本，才能壟斷市場；後者則需要扶植，開放，以補償幾年來的損失。從外匯政策上，從工商貸款的政策上，都可以反映出來。為什麼前些年時頭寸泛濫，助長物價，黑市金鈔生意興隆呢？明眼人可以窺知其間消息。經濟的

另一方面是糧食。但今年的糧食政策還是繼續抗戰以來的路線，他的成功是建在：一、人民把努力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貢獻出來；二、各省縣財政，交到極度窮困，以買物換低微的糧價，而把所有正當的開支，轉嫁到良善的小工商業者與農夫身上——三、是政府支出浩大的經費，約相當於所收糧食的價格數字的法幣。有些地方，幾乎收不敷支——這種支出，其實是養着大批糧官，和餉匪了若干交結官府的糧商。在這裏更要注意的，是糧價迄今仍保持着領導物價的作用，並未以「實價」而削弱其漲價的作用。另外一向領導物價上揚的公用事業，尤其是運輸郵電等，在這一內，儘管政府仍有補貼，而仍一再漲價。就中鐵路營業收入，一直未交國庫，亦未交部統籌；樂死兩路，餓死其他。有贏餘的路，建築、福利、式式具備；沒有收入的路，一切缺乏，借債度日，還要負擔若干不必要的開支。如此而經濟管制，豈非去國萬里？

政治

選舉。國大代表是如期選舉了——綏靖區除外。可是三黨在選舉中所表演的，都是令人啼笑皆非！從頒佈的國代和立委選舉法看來，大抵是參考其他民主國家的辦法而起草的。可是事實上，又是另外一套，種種問題都來了。首先是黨內派系作祟。凡是黨官——黨內既成派系的人物，在選舉會報中，差不多一律做候選無力量，而保有社會的信仰的黨員，大吵大鬧起來；鬧到招待新聞記者，自己認自己的垃圾。這個問題好容易讓「黨紀」壓倒，而民青兩黨提名要求保證的問題又來了。其實民青兩黨也太相信國民黨的紀律了。國民黨這些年來所維繫的團結的，毋寧說是歷史與感情。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的衝突，便只有自己。在上年六全大會時，李文窗因為沒有當選中委，憤然投遞請願書；某女同志痛哭流涕在大會場裏厲聲立夫，便是一例。這次各地方候選人的競選方式，首先利用黨的關係來說，固不着時便回家玩一五百人一競選。黨之地方政權，多與中央黨權有矛盾；安徽某縣，省政府支持的

人未中選，便指示縣政府「依法選舉」，即其一例。民青兩黨以絕對統制，期望國民黨，無怪其失望而抱怨「友黨保證多數落空」了！以此，國民黨中央，遂運用壓力到國選總所，可通過國選總所，悍然以政黨提名為唯一途徑，已當選的人士，不惜壓迫令其退讓。其作用只是維持「三黨行憲之局」，以此為民主的象徵，其後！

(上九第十七頁)

並非是逃避。——為了鞏固平津保三角地帶，平綏線的一路，都派了又開過來，一位參議員複述上次這個部隊到三角地帶的感想道：「我們在家裏是打過款手出去，到河北來，却是打着進來，又打着出去。我們河北的政治工作自己可以反省了。」

一位軍官批評王鳳崗，只有他一個的區域，可以看出組織來，他說：「他有一部份社會力量，因為他在鼓勵雙方的仇恨增加，所以他為的軍隊在這種空氣中，為了求生，所以不惜投降。最後一個也不肯投降。這是一組織民衆的一種方式。——河北新伐交響樂，沒有完結，好像正在開始。」

請看今日之河北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這消息報告一點大河以北的新聞。

石門陷落以後，河北省政機構又從保定遷到北平，而臨時參議會也在北平開會。勝利以後，後得流下眼淚來的人，如今在流下傷心之淚了。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而政治的基礎竟是在沙灘上。

中國通病

河北省臨時參議會開會時候，一位李鴻參議員問道：「要保衛着這最後的平津保唐等大據點，你們說，要多少兵才夠？要多少錢才夠？按着你們的報告書上所說，不算常備自衛隊，只算保安隊、保警隊，已有五萬多人，還有三個軍，也有五六萬人，他們的任務是什麼？能說地面太大嗎？三月開會時候，你們說有四十一縣，這時候呢？我想最多也不過二十幾縣吧。你們究竟要多少兵才能維持？再說出錢出

糧，上次我們問究竟出多少錢才夠？孫主席對我們說，每畝出三斗糧食才夠，今天我們加倍出到六斗成不成，新成縣已出到九斗了，照這樣下去，人民罄其所有，而官家不能統籌的結果，也總是出錢，那麼，你們說：究竟要多少才夠？」

河北省原按照江西的行政區劃而劃分了十五個專員區，最近專員能夠到任的只剩了第一區秦皇島、第二區塘沽、第四區豐潤(改駐唐山)第五區通縣、第六區灤縣、第八區清苑、第十區新改變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六縣為綏靖模範區。雖說有專員駐在地，並不能說明所屬的十縣或八縣仍然存在。有縣府存在的也並不就能代表那整個的地區。至少在目前的形勢，是山在對立，城鄉在對立，而且一天比一天尖銳了。河北人口習慣稱爲三萬，這一些城市所代表的是多少呢？平津都是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唐保則是五

十萬左右的小城了。河北省這兩年來施政花了多少錢。據上層報告：三十五年度花了二百五十萬，外有復員費七億。本年預算爲三百五十五萬，下半年又追加了六百一十一萬，最近又奉到補助三百萬元；一共一千三百萬元。這數字幾乎全爲中央撥給，至於地方貢獻了多少，則有位參議員說：「不知道比正額增加多少倍。從數月一次的攤派到一月數次的攤派，小兵官娶媳婦也由地方攤派，碗口大的樹都被研光，老百姓有什麼，他們就要什麼，這不就是民謠所謂「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兒來了一頭剃」的寫照。儘管兩年來有救濟款九十四億，振糧八千噸，行錢的各種賑濟剩餘物資又有六百三十二噸，被救濟的民衆計有九十五萬，自救的有二百萬人。也都是救濟。即使被救，而每人所得只是「振款九千元，糧食十四斤，衣服半件。」三千萬人中有十分之一在

流動，他們貢獻了所有，他們不會得救？這像個變形蟲似的河北省，越變越小，越變越壞。他犯的病症與全中國的病症是一樣的，就是貪污無能和「家天下」。惟一的女參議員李淑敏嘆息道：「這次開會還能有北平，希望下次我們能回保定而不是到了南京或香港！」

「河北會計處有幾個很重要的職員，一個是孫世洪，一個是何國宜，一個是何世貞，一個是孫含章。孫世洪作科長，是處長的大姑爺，何國宜當機要秘書是二姑爺，何世貞當秘書是三姑爺，孫含章當庶務是處長的太太，這種機關家庭化的作風，到底是什麼政治制度？」

「河北政治上有所謂「三張四維」，「三張」是指縣人而言，高升不免因爲是孫世貞主席的同鄉。第一次參議會開會，拖了兩個縣人下台，一個是財政廳長旋

不是我寫的人，他連我家的衙門口向那方開都不知道。我希望流言止於智者，勿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人事制度不能建立，下層要負責，上層豈能無責。更上一層，對河北這樣一個殘破局面，一年多來，專員犧牲了一位，縣長犧牲了二十多位，石門陷落後又有十一位流亡縣長在行蹤不明的狀況下，可是從本年六月以後，行政院派來了爲綏靖區訓練的縣長四十六名，內政部又分發到了二百三十六名，新來的對地方自然不熟悉，而去年派去的縣長六名，到如今一個也不肯出去。主事說：「這樣的矛盾之下：文武雙全都要一人担；那麼，能夠「剿匪」的也就特別被重視而不言較「小節」了。」

家河不得

「河北會計處有幾個很重要的職員，一個是孫世洪，一個是何國宜，一個是何世貞，一個是孫含章。孫世洪作科長，是處長的大姑爺，何國宜當機要秘書是二姑爺，何世貞當秘書是三姑爺，孫含章當庶務是處長的太太，這種機關家庭化的作風，到底是什麼政治制度？」

「河北政治上有所謂「三張四維」，「三張」是指縣人而言，高升不免因爲是孫世貞主席的同鄉。第一次參議會開會，拖了兩個縣人下台，一個是財政廳長旋

不是我寫的人，他連我家的衙門口向那方開都不知道。我希望流言止於智者，勿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吏治進行曲

食污的質問如波浪進行，這是吏治進行曲

汪廣平說起冀東區的黃專員，他的駐地本應在玉田，却收到豐潤地廳公司的任經理也無下落，這些案子辦了沒有？新任經理找不到專員區內安撫民衆，竟

修槍造彈、房東是一位黨部委員，非要收房不可，而他却強佔不交。最近國大正選舉，他是四區選舉事務所主任，却不顧職守，回到河南原籍去競選了。至於選化、平谷、玉田在「戰略撤退」前半小時才通知，以致縣長丟了行李，難民到現在平唐一帶還在露宿。尤其奇怪的還是應保存的，而爲何硬要編到豐潤的團練之內，餓了一天才答應，收編時一律降一級。一投降的八路軍收編時還升一級，爲什麼對自己地方人還要降一級？」

黃濼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是私自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爲了自衛團，後來索與就直接不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怎麼辦了？」

在天津內道邊，這是不
是有新職守？
刑律巧問案：這
世昌專員因案撤了職，
但是辦不辦呢？結是一
查「不出「來」，這個
專員找不到，那個專員
馬馬虎虎算了，我們河
北省十分之六的專員都
是不稱職的。你辦不
辦？

范乘之間既然是一
「專員劉培初貪污有據
撤職查辦了，又為什麼
讓他逃去，而且到國防
部去作了官，到今天一
查就打生話，沒有辦法
，有罪就該立刻撤職，
也不必等他回來時想偷
偷摸摸把他扣起來。這
是不是還有法律？

至於縣長的問題却
更難了，據民政廳長在
口頭作答覆的，有真鄉
黨縣長，貪污公款是
層所為。三河周縣亭因
殺人如麻，送了法院，
他是剿匪的前三名能手
，多殺幾個人算了他麼
？「昌平張縣長因殺匪
被控。清河李振宇縣長
貪污是辦公費不納用，
武清縣長朱再用只是除
了縣府所存的樟木作箱
子。對灤縣及順義前縣
長的案子沒有答覆。劉
古復縣長逃到那裏，還
沒有找到。張運符案仍
然在查。
「清花縣二年以來

換了四位，沒有一位縣
長能夠開辦域外的村落
的」。周道川這話說：
「最近這一位在每天修
城防工事，在每天修
要自己留下一百多名
到城隍廟衙門，那
裏的三十多家商店被關
逐了，縣政府的門樓修
得除了不及經管的之外
，比較誰的都大。一
個管四十幾個村的縣政
府，已十萬火急的時候
自己修衙門，而經管省
府和專員三個大機關在
城內誰也不管？城外的
二十里內為了掃掃射線
，是既折民房，又遷民
墓，民衆出錢出力不要
緊，難道就不愛民心？

保警隊每中隊一百零
四人，一月只有三百萬
元，三萬多人，每月的
差額更大，中央答應從
十月份起補助，但到如
今仍是沒有補到。」
石門來人說：這次
戰役中，保安團打了五
天，羅軍打了五小時，
而保安團還是單衣無補
給，元氏魏團長子和報
告，他們是以必死心情
作戰。於是孫民廳長也
這說：「

地方武力是有力
量的，上次匪入房山，
我們自衛隊沒有損失，
却打死了七八百，十一
月十六日匪入武清，新
任縣長帶著弟兄們就打
了十二小時，在多少次
戰爭中，我們人民的英
勇超過了軍隊。常夢月
參議員問道：「我們的
十二保安團，由東明長
垣負其薪餉，却調到河
南軍去了，是不是我
們的軍隊要給別人作機
關？

武力與成敗

軍隊很多，軍隊要
保的是不讓保唐大據點
及鐵路線。至於而面全
要保民求武力，保安隊
、保警隊，常備自衛隊
，及零星巡邏組織。最
後者是公開被禁的。
「保安隊現在石
門三氏都表現得很好，
一緊受松祿青長說：一
可是在中央沒有答應編
入戰鬥序列以前，保安
十五個團，二萬人，每
月的主食費不敷三十億
，衣服費不 六十五億

房山縣的長頭鎮一千
多兩隊又是一個沒有放
，而報紙上的宣傳頗像
的意見。真鄉的要地方
糧票子，不准少給一條
；派派的去給烙餅吃
，人們稱之為烙餅隊；
房山縣的，到現在恐怕
還在搶糧中；真鄉的地
方糧本本來要改組的，
花了幾百錢傾又成爲過
，在房山，玉米沒
收，就開始搶，到現在
也還還沒有搶完。這是
不是土匪？第四總隊所
完了碗口大的樹；有人
登了報，鬧怒了他們，
硬向地方撥派二千民夫
，你們知道不知道？」

子介中參議員問道
：「政府對於地方武力
是不是有顧忌，聽說石
門庫存的槍支就丟了許
多槍枝，為什麼不早建
立民衆武力？聽說保定
軍械庫也不少，有沒有
武裝人民的決心？肯不
肯發出去？」

李濟參議員應聲道
：「民衆力量好的很多
，但壞的也不是沒有，
今年五月其地的賈店車
站，二十幾個匪軍沒放
一槍就入了車站。地方
人說，他們早就知道，
因爲保安隊帶着，餉費
早已撤退了。逐縣馬頭
鎮報上說是打死了幾千
人，結果也是一槍沒放

長是七月上任的，他向
大眾報告道：
「我的任務很簡單
，那就是向中央要錢。
我們說不上理財，值
作爲一個出納。可是面
位要領事，只有窮人是
天下最慷慨的，向人索
錢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河北省的財政在天
文學數字中徘徊，支出
的龐大如駱駝，而收入
相形之下如針尖。北平
的物價總指數到十一月
中就已漲到戰前的十一
萬五千倍，北平市公教
人員是按一級待遇的總
在叫苦連天；而出了城
圈到省境內，就是二級
待遇了，真是難爲當家
人，他不能將作無米之
炊，而且連鍋都將破成
片片了。
「這一千三百億的
重點，是剿匪第一，也
就是先發保安隊警的經
費。中央答應撥軍特
退而款額却沒有應到。
其次是收職員及公費的
學生，今年一月至三月
我們的膳費是每月每人
三元，上月已增到二
十元，最近又增加了四
百元，若是近着物價的
，那真是差的遠，只是
我們的一點意思。再大
是民衆救濟，可是軍軍
團，難民增多，真也
救不勝救。」（有人已

我們想把保定自
衛團的團長煥恩明；他
是地方上的民衆英雄，
派他去作博野縣長。」
孫廳長最後說：「
我在檢討會議上說過，
縣長要兼文武，我們受
着重他，人民是基本的
武力，要愛護他。但更
治不能翻新，是政治的
失敗，民衆不能安撫，
是政治的失敗。如果不
能革新，我一定辭職讓
賢。」

駱駝與針尖

武力是政治的延續
，經濟又是武力的延續
。河北省地方稅收極
極整頓才每月十億元
到五十億元，這其中有
一部是靠着通貨膨脹
的影響。英國留學生，
研究過理財的高文伯

表示這一種意思最好向
難民從軍去復仇。每名
難民壯丁的安家費規定
是四百萬元。今冬還要
徵兵一萬五千名，以萬
名計，那這就是一萬名
青年難民有了出路，而
四百萬安家費來自民間
，豈不一舉兩得。」
從建設方面着眼，
可能的公產整理也限
於平津保定四大城的附
近。北平附近門頭溝
小煤礦裏也就不管地方
上的反對，設立了礦務
局，與當地的警備司令
部聯合辦事處相對照
；天津附近敵人遺下的
聖樂農務場中，選出上上
地就設立了小姑農務
：從事於米、麵、油、
唐山附近有的商會產業
處理局承辦的，在中紡
勢力範圍內抽出來的華
新紗廠，可以從棉花上
賺一點錢；英人的開闢
也有一部分官股，每月
也要發給五六億利息。
要養蠶生蠶，先要有
錢有閒，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河北省地方稅收極
極整頓才每月十億元
到五十億元，這其中有
一部是靠着通貨膨脹
的影響。英國留學生，
研究過理財的高文伯

一方面，只有百分之十
的棉花稅後獲利；中紡
一家就出到百分之九十
，共有一百二十億。牛
羊稅卻很不順利，在食
肉者的反對聲中只收到
了十億，去預料共遠。
計畫中還想收點鹽稅，

快一些見效的加稅
。要養蠶生蠶，先要有
錢有閒，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一方面，只有百分之十
的棉花稅後獲利；中紡
一家就出到百分之九十
，共有一百二十億。牛
羊稅卻很不順利，在食
肉者的反對聲中只收到
了十億，去預料共遠。
計畫中還想收點鹽稅，

北大自治會競選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大通信) 北大以前並沒有學生自治會，復員以來，院系擴大了，學生的福利校方已無法全部顧及；故去年下期，胡適校長即與學校首負責人協議，協助學生成立自治會。學生本身，由於一年來許多事實的教訓，深感北大一向的散漫作風，實不足以適應當前的環境，所以亦一致要求從速組織一個強有力的自治會。現在自治會已經成立。全校師生已經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使命，而這次選舉選舉的民主精神，在實施憲政的今日，更有其示範的意義。

一個特色

自治會成立的先聲，是十月十九日的代表大會成立大會，賀麟訓導長曾出席指導，他提出自治會的使命有四：一、是達成其好的校風，二、是增進同學的福利，三、是促進學術的研究，四、是促進民主的實現。而這次大會主要的工作

是訂定會章。事實上，會章的訂定並非是幾十個代表之力，在開會之前，各社團，各系級都有過熱烈的討論，各代表則將這些討論的結果作一個最後的表決。這是自治會的最大特色，就是自治會推選理事會由各區分會推選理事組成，因之理事的選舉不是沒有全校性的普選，而由各分會各別普選，各分會選出的理事，一部分即為總會的理事。總會理事會與分會理事會不同處，即一為決策者，一為實際的執行者。這種特色乃因客觀環境所形成，因為北大的校舍非一體的，而是星羅棋佈的，欲反映全校的民意，總會理事不得不按各區人數比例選出，而各分會都執行總會與代表大會的決議，是雖分而仍為一體。

理事選舉

代表大會的第二使命是辦理選舉。為辦理其特種選舉委員會，限期完成任務，故

十月十九到十一月十六這一段日子，在北大是不平凡的。首先是各系級推選候選人，幾天之內就已辦好，棄權者佔最少數。接着而來的便是競選了。參加競選的多為系會、級會，用橫貫的文字把他們的候選人介紹給大家。候選人自己出來競選的不太多，但競選晚會中卻當仁不讓地發表政見。競選最熱烈，最有力量，最成功的，是沙灘區二十幾社團的集體競選。沙灘區分會的理事共十九個，他們就慎重地推舉十九個候選人，辦壁報、印傳單、廣播講演、火炬遊行，盡其最大的宣傳力量。這樣，他們雖然形成爲「多數黨」了。

校長鼓勵

學校當局看這熱烈的場面，深覺北大有前途，在講演晚會中，胡適校長和吳之椿教授等都帶着愉快的心情趕來講演。胡校長說：北大過去所以沒有自治會

，乃因北大學生太愛好自由，注重個人的發展，把公共事情忘掉了。個人主義不可諱，真正的民主即建築在自由與個人主義之上。不過，公共事情仍須大家出來管理，但能人人參加公務，這便產生了所謂代議制度。代議制度欲行得好，有賴於選舉的民主！而選舉的民主，決定於提名。因此，他強調提名的要緊。他覺得這一次理事候選人太多了（全校共二百餘人），選舉難於集中。他希望大家在投票前對候選人加以研究，誰好就一定要選他出來！誰不好，就要設法打敗他。他說他今晚來參加這個晚會，就是特地來爲同學捧場打氣的。最後他說：「民主不應該以多數人壓迫少數人，你們要容許少數黨也有說話的機會。」吳之椿說：從校外的選舉來看，校內的選舉，不勝感慨，他說：「你們的選舉是在和平的氣氛裏舉行的！你們的候選人是白己提出來的！你們競選的動機是純正的！外面的選舉……」

十一月十四十五兩日是投票日期，兩要區都有票箱，牆壁上貼滿了標語：「不要放棄你北大的權利！」這「北大的權利」是什麼呢？就是每個人都得投票。憑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圈選理事，宣佈只是個參考而已。每個人在投票時，都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都怕選出無能的甚至別有企圖的理事；對於不熟悉的人，往往問而又問，或者少選幾個。每個人都希望自已圈選的人，即是中選的理事。

十六日，各區公開開票，沙灘區的民主廣場擠滿了觀看的人。大家親眼看見票箱打開，親眼看見選票從票箱裏一張一張的被宣讀，親眼看見選委委員在牆壁上給候選人記票數。一切的一切都在眼裏，這這不是民主嗎？公開嗎？但事後也有人提出查詢：因爲沙灘區中選的十九個理事，都是二十幾個社團推薦的，不差一個。質詢的人以爲這中間說不定有「鬼」。其實，稍加分析，便知道不足爲怪。二十幾個社團的基本票已經不少，加之他們推薦的這十九個人都是羣衆所熟知，支持的人自然較多，因之這十九人所得的票都在五以上（沙灘區共收選票一二三六張），比起其他沒有集團支持的便佔了絕對優勢。如果硬說有「鬼」，這「鬼」就在不該「集體競選」，但民主政治却明明允許這一套。故此種質詢並未激起什麼波瀾。

農院風波

現在，除羅道莊的農學院外，各區的理事都已選出，每區所收選票都在各該區百分之八十以上，四院新生選票者尤少。各理事當選票數約佔選票數百分之四十至六十。連日來，看北平市國大代表選舉的情形，我們怎能不說這是一偶成功的選舉？可惜美中不足，在北大更進一步團結的時候，農學院自治會曾備有四個委員提出要脫離總會而獨立，爲另三個區而獨立，於是提出公決，結果以九十一票對九十一票保持不變。如果大家不過問，農學院又將繼續其一年來與北大其他各區脫節的特殊環境，將來北大的學生運動又會被分割爲一部分人的行動。最近留在沙灘的農院一二級同學，對此已提出嚴重的抗議。北大是團結的抗戰，將是暫時的！

鼓勵仇恨

政府逼到保定不到半年，最不能令人痛恨的就是在石門陷落的第四天，——十三日省府秘書長，還向外界說不會遷移，十四日就分坐了十輛汽車，外有其他車輛六十輛，一天就趕到了北平。

「我承認錯誤，」代表人答覆了：「一是我們當時並沒有與石門發生聯繫。爲聯繫便利，遷到豐台是孫主席二十天以前的命令，因爲新二軍來接防，所以延到那時才動身，我們（下接十四頁）」

投票與開票

十一月十四十五兩日是投票日期，兩要區都有票箱，牆壁上貼滿了標語：「不要放棄你北大的權利！」這「北大的權利」是什麼呢？就是每個人都得投票。憑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圈選理事，宣佈只是個參考而已。每個人在投票時，都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都怕選出無能的甚至別有企圖的理事；對於不熟悉的人，往往問而又問，或者少選幾個。每個人都希望自已圈選的人，即是中選的理事。



從冷仗說起

費孝通

寒流日漸南渡，缺煤的歐亞居民，縮緊了脖子，爲着將臨的嚴冬發愁，美蘇的「冷仗」却愈打愈熱了。「冷仗」Cold war 是美國專制作家李普門用來描寫兩雄爭霸的局面的新名詞。這是一場不用槍砲的戰爭。冷仗的軍火是金元、麵粉、動聽的許諾、無情的諷罵。遠地傳來，冷仗打得比熱戰還響亮，成功湖竟以「毫無成功」之名喧傳世界每一角落。可是這究竟是陣虛熱，在有煤斤有麵包的交戰主角實在還沒有所傳那樣熱心。

克爾姆宮裏慶祝十月革命的心情是悠閒的。「絕不信第三次大戰會上演」。「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大可並存，而且如果願意的話，還可並榮」。——所說的還是舊調。被輿論導線所糾纏的禁地裏的人民們究竟在作什麼活，我們固然無法知道。但是就那些不犯禁的蘇聯報紙看去，國際新聞的地位被壓在角落裏，使我們這些看慣中國報紙的人覺得古怪。這篇最顯的是生產數字。說這是政府的一「愚民」政策也好，說讀者不關心國際時間也好，這些戰後有建設機會的人民，過分熱心於生產的心情，我想是不難瞭解的。如果我還能回到中國戰前的數書生活，我很不能相信在這時還寫着這些文章。

美國的情形呢？報上的專電看去似乎應該忙着一「杜魯門主義」一「馬歇爾計畫」了，至少也得時常想想明年選舉個總統之類問題了。可是事實上却並不如此。當華盛頓的官場鬧着要召集臨時國會給馬歇爾計畫去續續冷仗時備下足夠的軍火，美國人民的注意力却在紐約 Ebbets Field 球場上「洋克對羅連」(Yankee V. Dodger) 的棒球比賽。英國旁觀者周刊的記者有一天在離紐約五十哩之外的小鎮上，剛逢着那球賽到了重要一場的日子，這小鎮的中心廣場上高懸着一個廣播器，放着在場觀戰的廣播員的口頭描寫。廣場上擁擠着男女老小，每聽得某一方得了分，就起一陣歡呼。「洋克」領前，但是「羅連」和緊緊的「羅連」上，當「羅連」轉攻爲守時，小孩子跳了一陣還不夠，在地上跳起筋斗來，年紀大一些的，把帽子代替身子，滿大各色各樣的帽子在舞動，真是一場有聲有色的奇觀。那記者看得口呆目眩。——美國人的與致

夠高了。這球賽連續了幾星期，杜魯門、馬歇爾等名字在收音機上被 Jackie 搶走了。

Jackie 是 Jack Robinson 的小名。這是一位黑人球員，屬「羅連」隊。黑美能進入球隊，和白美一起玩，在美國傳統上說來是空前的。其實如果 Jackie 的幸運視作美國種族偏見逐漸在消失的證據，未免過分了些。黑美在難要的技术上本佔重要地位。球本來不算是要緊的，但究竟還是供人玩賞的技藝，尤其自從球的重要性能「玩」變成了一「賞」之後是如此。我不知道 Jackie 的風頭是說明了黑美從末技(像舞和樂)升入上技，還是棒球從上技降爲下技。可是無論如何他吸引了老美的注意力却是事實。

Jackie 被選入「羅連」隊是有作用的。洋克隊的退名選手。羅連隊處於下風，好景是在球場「被人欺侮」的地位。老美的性格却總是同情於 underdog。誰被八欺侮就值得同情，誰處於下風也就有理。因之，他們都愛這一「羅連」隊——名字也提得可憐——盼望他們能打倒這「羅連」隊的洋克隊。Jackie 是黑美，更屬可憐隊中的可憐虫。我說「可憐」並不確切。老美對討厭沒出息的乞憐者。他們的理想人物是被人欺侮而骨頭硬，肯努力，有本領，把欺侮他的人打倒，翻得了身的弱者。老美心目中的公道就是如此。這是在羅連隊轉敗爲勝時，小孩子跳筋斗，大人飛帽子的原因。

如果我說美國人民對國外的情形也看成了一場球賽，似乎太冷酷了一些。(拉斯基教授却真的這樣說過)。但是，他們那種同情於有骨頭的苦難者的心理却是很重要的。他們對於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的內容明白到什麼程度很可疑。據說有一位負有政治使命來華的名記者，聽人家說起「雅爾達」，他虛聲若谷的用臂膀敲敲坐在旁邊的朋友，輕聲的問：「雅爾達是什麼？」我更不用提有一位連我們的王席姓姓還是姓石都弄不清楚的大使。這些對於有百億金元可以外借的富國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却是誰值得效忠，於是這深入人心的傳統觀念，能不起作用呢？美國政府明和蘇聯開冷仗，目的且不必管，這仗的軍

火是金元和麵粉，得向美國人民去要，甚至得要求老百姓少吃一些才夠應付這冷仗的消耗。人民的心理是要捉摸住的。於是第一步要把美國政府選定的貸款對象描寫得在「被欺侮」，一付窮相。這倒不難。本來就帶着一層神秘氣氛的斯拉夫民族可以拍出來做「欺侮人的壞傢伙」。在他鄰近的人自然該是被欺侮的了。困難的倒是第二步。一個沒出息的乞憐者又引不起老美的同情。所以一定要叫貸款對象表示出很有出息。那是馬歇爾計畫比杜魯門主義進步的地方。杜魯門把款送給希臘和土耳其，可是希臘不。氣，受了美國人民的批評，杜魯門無法交代，馬歇爾出場收變方針，轉向有出息的「德國」「法國」「英國」。

馬歇爾最不喜歡聽的是說他的計畫是個美國經濟的自救政策。這樣說不是太不領情了麼？而且，這樣說也等於說美國非貸款出來不可，不排洩一下，自己會強出病來。果真如此，接收他貸款的反而不是給美國幫忙了。面子還不要緊，講起條件來，美國的處境就不硬了。因之，在他飛去倫敦之前，選得在芝加哥痛罵一頓「誤解美意」的人。其實公平一些說，那是兩全其美的事，大家買面子也不關緊要。如果說美國「借不借由我」也不是實情。據聯合國經濟專家的報告，美國如果不能有繁榮的國外市場，繁榮的國外市場不是大家願意的麼？問題却在美國政府要人們袖手裏的政治計畫。他們要同時和蘇聯打冷仗，把自然關入「冰地獄裏，不見陽光。這個打算之下，貸款不能不帶政治條件。於是問題複雜了。連馬歇爾自己也不能不在答覆議員的質問中說出「情形複雜」四字來了。

情形太複雜，怎能叫沒有機會到國外來調查過的美國老百姓弄明白這局面呢？同時，有煤有麵粉來過冬的人也何必去弄清楚這個複雜的情形呢？外國的人名和地名真麻煩，甚至有把姓都倒放在名字之前的人，那麼重要的會議又找到普通地圖上，小學教科書上沒有的小角落裏去，不是有意爲難除了要應付考試不再說地理和歷史的人麼？於是，那是人情之常，你我均非例外。還是把收音機上的轉鈕轉到更動人的電波上罷。Jackie 是多順口的名字！冷仗的特點是交戰對手可以冷靜靜靜做動口的君子，而在旁觀戰，也許聽戰更切當些。的人却亂得像熱石頭上的螞蟻。

寒流過得人發抖，爐子裏沒有煤，爐上沒有麵包，還是難受。聽說有人肯在雪中送炭怎能不拔長了耳朵，聽摸官正的心理。如果天下祇有一個債主，就是美國，也

得上他的門，不然他會演得出一「威尼商人」呢？情形複雜的原因是在打冷仗的債主，各有各的條件。借了甲就管得甲，借了乙又管得甲，甲乙是怨家。

處在甲乙兩個怨家之間的人們，假如齊心，正可以從甲乙的矛盾裏取得較寬的條件。無奈齊心一字太不易做到。這些需要借款的國家已受到上次大戰破壞最深的國家。這破壞並不單指物質上的，在社會組織上一樣把原有秩序破壞了。凡是不滿意於原有秩序可以說受了這次戰爭的解放，那原有秩序過日子的人却感覺到式微和毀滅了。任何社會固然不能長久處於混亂的過度狀態中，但是安定在怎樣的秩序之上呢？回到原有秩序去，還是創立一個新秩序呢？這裏按下了「不齊心」的根苗。

甲乙兩個可能的債主，各有主意，甲想借錢給這些在混亂中的人回到原有秩序去。他不但明白有任何比原有秩序更好的秩序，而且他為了要維持自己原有的秩序也不願在別地方有新秩序出現。乙却反是，它本是個第一次大之後形成的新秩序，他也不明白為什麼還要這些在混亂裏的人退回原有秩序去。同時，同樣的，他自覺孤單，很盼望有類似他自有秩序的國家出現。於是甲乙不同的主意，把想借款的國家裏的人民也分裂成兩種不同的看法，一向甲，一向乙。款還沒有借到手，內部的分裂已引起了各種程度的衝突和磨擦。

這種情形至少也是不幸的。戰爭的傷害未復，繼續着這無法正當從事生產的局面，人民的痛苦更甚；痛苦更甚，心緒也更不寧，社會浮動，人心遑遑，任何秩序都建立不起來。自力更生罷，先得國內齊心，不再作無謂的消耗，束裝壯帶，咬緊牙關的苦幹。像英國那樣社會秩序沒有混亂的國家，加上他們政治的素質，教育的程度，免強在亂路上走，可是問題固然是簡單了些，困難却還是重重。克利浦斯的坦演說，承認即使依了他的計畫做去，如果借不到錢，英國的經濟還是沒法平衡的。他說，這是個史上難於避免的難關，不是誰能做得好，誰做不好的問題，而是全英國人民不能不受過甚的痛苦渡過此關。英國政府是打算過制生理上需要來爭取時間，等待條件較有利的借款。這又是「冷仗」，英國得準備萬一美債不下的可能，所以非克苦忍耐不可。由素食而且皮信宗教的克利浦斯來掌握經濟船舵，不但由於他卓越的能力，而且也是由於他富於象徵作用的資格。願上帝祝福這從不妄自弄神的國家。

就是在這深知借錢渡日是件恥辱的英國，寒冷和飢餓

的影子（也許缺乏汽油和香煙是比冷餓更難受）也已經使在上次大選中沒有投票的中產階級回頭在這大地議會的選舉中支持保守黨了。選舉結果工黨在一千五百個本黨工黨的議席被保守黨奪去了六百席。數目是驚人的，但是仔細一分析，情形還不算過分嚴重。在這次地方選舉裏有幾會投票的總數是一千五百萬人，而其中有六百萬人却沒有去投票，這給保守黨先佔機會。舉一個實例：在肯特郡的地方在六星期前曾舉行過一次國會議員的補選。工黨得一萬八百二十七票，保守黨得八千八百七十四票。地方議會選舉工黨得八千七百五十九票，保守黨得九千七百六十三票。保守黨所多的票並不是由於本來投票的人變了心，而是從其他政黨那裏搶來的。在補選中工黨得一千一百二十二票，地方選舉中一票都沒有。所以工黨的失敗是出於有二千多支持工黨的人棄權的緣故。工黨的刊物「這次失敗的分析」認為並不嚴重，但是六百席地方議員的損失是個事實。保守黨勢力在增加也是不容否認的。

歐洲的嚴重局面並不在英國而是在大陸上。多事的歐陸讓我在下次「爐邊天下」中再談罷。

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清華勝因院

（上接十三頁）可是，要和這些國家合作，我們就得付出代價，這代價便是貫徹我們對內的社會主義政策，使我們能够生產和担保對於這些國家所應交換的工業品輸出。並且，若是我們要做到能相合作的計劃經濟，更需要政治上的信任和親善。這就牽涉到工黨對於歐洲各共產黨的態度問題。

筆者相信斯大林關於共產黨情報局所說的話是真實的。他說：這個組織並不是第三國際的復活，而是某些國家負有重大責任的共產黨間的自衛和互助。事實上，東歐和法義的共產黨，是和蘇聯與一九二〇初期的各國共產黨，具有很大的不同。現在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是政府內的政黨而不是革命的政黨。雖是在法義，若是政府為了維持右派的永久統治和排斥工會和勞動階級代表的參預政權，而認為應該接受美國的金元，那末，共產黨也會被迫而採

取革命的目標。果真如是，則此自衛將在義大利為絕大多數的社會黨所共同參加，在法國凡社會主義者不願跟隨黨政策走的也將站在工人的一方，取高樂的政策乃在強有力政府的建立，私人企業的復活，和聽任美國在對蘇作戰中支配法國。

對於今天歐洲強大而成熟的共產黨，仍用一九一七年列寧的戰略來解釋，未免過於陳腐。例如，捷克和波蘭的共產黨都含有許多天主教徒，在前者又含有天主教神父。波蘭共產黨的一個領袖曾對筆者解釋：從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得不經過無產階級獨裁的階段。這種說法，捷克共產黨的一個領導者也曾講過。從馬克斯的社會分析來看，這說法的論據如下：當勝利時，整個國家的法西斯機構頓形崩潰，在這機構下所形成的公務員、法官、教員、警察、軍隊、以至地主和大企業家也跟着沒落，於是經濟權力的樞紐自然地落到勝利的抵抗者和他們政友的手上，這時社會主義的建立就沒有不能用和平和民主方法的理由。

但是我們正從各方面聽到關於美國議論着戰爭，美國準備着戰爭，和美國在西部德國和希臘所採挑戰政策等，所引起的恐慌。波蘭國會中一個天主獨立黨議員 Dr. Frankowski 曾告訴我們——他並且叫我們引述他的話——說：「你們西方人士若是真想幫助我們發揚一個自由的和基督教的文明，那末，你們須得了解，你們對此所能給予的最有效的幫助乃在終止你們和蘇聯的爭吵。」他說：「和平和貿易乃是民主和自由可得發揚光大的唯一條件。他又指出：在理論上，共產主義和天主教義有如水火不能相容。但是在實際上，天主教徒和共產主義者却都覺得可能互相適應和妥協。在波蘭，他說，現在沒有宗教的迫害，他和國會中的同僚，從極右黨派到共產黨員，都能友善相處，不僅在私生活上，也是在政治上。」（本刊特約譯者譯）



游歷者的眼睛

錢鍾書

The Traveller's Eye 作者：Dorothy Carrington 一九四七年 倫敦The Pilot Press 出版 十八先令

游歷者非其眼睛不可，然而只有眼睛是不夠的，何況往往戴上顏色眼鏡呢？託利亞諾（Toriano）收集的意大利諺語裏，有一句說：旅行者該有豬的嘴，鹿的腿，老鷹的眼睛，驢子的耳朵，駱駝的肩背，猴子的臉，外加飽滿的錢袋。豬嘴驢腿耳似乎比其他更重要：該聽得懂當地的語言，吃得慣當地的菜餚——菜餚是文化在日常生活裏最親切的表現，自從十七世紀西班牙批評家以來，西洋各國語文裏，「文藝鑑賞力」和「口味」是同一個字（taste），並非偶然。例如許多在中國觀光的洋人，飲食起居，還守著自己本國的方式，來往的只是些了解自已本國話的人，這種游歷者只像玻璃缸裏游泳的金魚，跟當地人情風土，有一種透明的隔離，隨他眼睛生得大，睜得大，也無濟於事。至於寫游記呢，那倒事情簡單，無須具有這許多條件。因為游歷是為了自己，而游記是為別人寫的；為己總得面面周到，為人不妨敷衍將就。所以許多游記的作者，除掉飽滿的錢袋以外，並無靈敏的耳朵等，只有愛爾蘭一位放牧家所騎馬蹄似的手指，能夠筆不停揮，在又光又白的稿紙上行千里。

這種游記常常膚淺荒謬，可是有它的趣味。並且議論愈荒謬，記載愈錯誤，愈引起我們的好奇心，幫助我們的幽默感，因此它也可以流傳久遠。這跟文藝批評一樣：對於一件作品正確的估價，往往使人智而相忘；但是像雷瑟（Rymer）批評莎士比亞的「奧賽羅」（Othello）或是

「馬鳴大吠」，傑勿雷（Jeffrey）批評華美華斯的「漫遊」詩說：「這不行」，到現在還被人傳作話柄。譬如這本游記裏的游記裏，就有這類東西。

這本書是自古到今英國旅行家的合傳，兼英國人的游記選。簡短的「引言」以後，分兩大部：「向東旅行」和「向西旅行」。「向東旅行」部裏分：法國、意大利、土耳其、亞洲、中國。「向西旅行」部裏分：西非洲與西印度羣島、美洲、太平洋。對於每種書和它的作者都有敘述和批評，在「夾敘夾議」之中，引了長篇大段的原文，彷彿把珠子貫串在線索上。有時也許一顆顆珠子擠得太密，我們勉強瞧見些線索，但這足以表示作者材料的豐富。她所蒐采的不但是游記；自傳、日記、書信，以及小說（像七一—七三頁所引Baron Corvo的作記），拾在籃裏都算得來。奇聞妙事，應接不暇，舉一例為證。我們知道英國使臣來中國「進貢」，因為不肯叩頭，引出許多糾紛；而據這本書的選載（第一六七頁），有個湯麥斯曼寧（Thomas Manning）最喜歡向中國人叩頭，從來不肯放過跪拜的機會。可以補充兩點：這個曼寧就是蘭姆（Lamb）書信集裏常見姓名的那一位，也就是論「烤豬」那篇散文裏的「M先生」；他對叩頭的態度，使我們聯想到印度的普達王——這位國王向和僧們叩頭，因為豬頭牛頭羊頭全有寶主，只有人頭送給人都不要，這證明人頭最賤，叩個把頭，不足介意（見大正本大藏經第五二二種普達王經）。

從全書體裁上看來，頗多費解之處。何以沒講到德國、俄國、西班牙、日本、南美洲等處？難道自古到今英國人沒游過這些地方？還是沒有記載？既然收錄的範圍那樣廣泛，包括傳記小說等等，不應該欠缺關於那些地方的材料。即就所敘的地域而論，也有許多非講不可的游記，作者都略而不道。例如Richard Burton的名字只在第二六三頁上帶過，他的奇情壯采的「回教聖地旅行記」一字沒引，又如拜倫和雪萊的好朋友E. J. Trelawny連名字都沒有；他在旅行家裏算得一聲人物，他的游記不是僻書，游蹤也很廣泛，到過南洋羣島，打過中國人和荷洲人的船，中國的鹹鴨蛋首先見於陶宗儀「輟耕錄」，在英文書裏，以我所見，則以此書的描寫為最早。Baron Corvo的小說佔了兩頁，而James Morier跟他在Haji Baba of Isphahan隻字不提。緣故是Baron Corvo這幾年來忽然走紅，而Morier的好小說——據我所藏一八九五年重印本前面Curzon伯爵的序說，只要這部書跟另一部游

記存在，其餘關於波斯的书籍全可燒掉——知賞者還寥寥可數；別以為歷史家好古，他們持趨時，他們所好是時髦的古代，不時髦的古代，他們也不屑理會的。A. W. Kinlake跟他的「東游記」也沒有提到，真使人不能相信。這種例子，不必多舉。我反復研求，始終不了解作者去取的用意和標準。

全書給我們一個印象：英國「游歷者的眼睛」大半生在頭頂上的。他們對外國的讚美，也彷彿是傳旨褒獎。作者選及Smollett的游記，未說起Sterne的游記。Sterne在他的游記裏給Smollett一個混名「Smelfungus」，說他懶狹偏見，厭惡一切外國事物。這個混名可以移附許多英國旅行家。也許惟有這種固執驕橫的人纔能建設大英帝國，還是仗仗了大英帝國，這種人才變成那樣固執驕橫呢？我上面講到游歷者的嘴，本書作者曾引Philip Thackeray的法國游記，但未引及此人自記在法國吃餛飩子的故事。此人儼旅館中煎菜不乾淨，不要吃；女侍者糊裏糊塗上了一個碟煎菜，此人一時怒發，把碟子連菜合在女侍者頭上，替她「加冕」。這是十八世紀末葉的事。在十九世紀末葉，法國小說家真固兄弟的日記裏有這樣一節：「做了法國人在法國旅行真是回響。一起吃飯的時候，驕身上，好吃的有一部分是給英國人吃去的。何以故？因為英國人不把侍者當人看待。」（Journal des Goncourt, t. III, 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近來的英國旅行者似乎沒有這樣氣憤了。

這本書有「引得」，可是所註頁數，沒有一個對的，相差兩三頁以至五六頁不等。錯得如此徹底，也值得佩服。

（上接二頁）有迅子官似紙配給之必要。同人等除即推派代表向政府申請外，應請各界人士，共同籌劃，以期早日實現。此項工程，關係重大，非僅個人之事，實為國家前途之關鍵。故望各界人士，踴躍參加，共襄盛舉。此致各界人士，敬頌健康，此致。